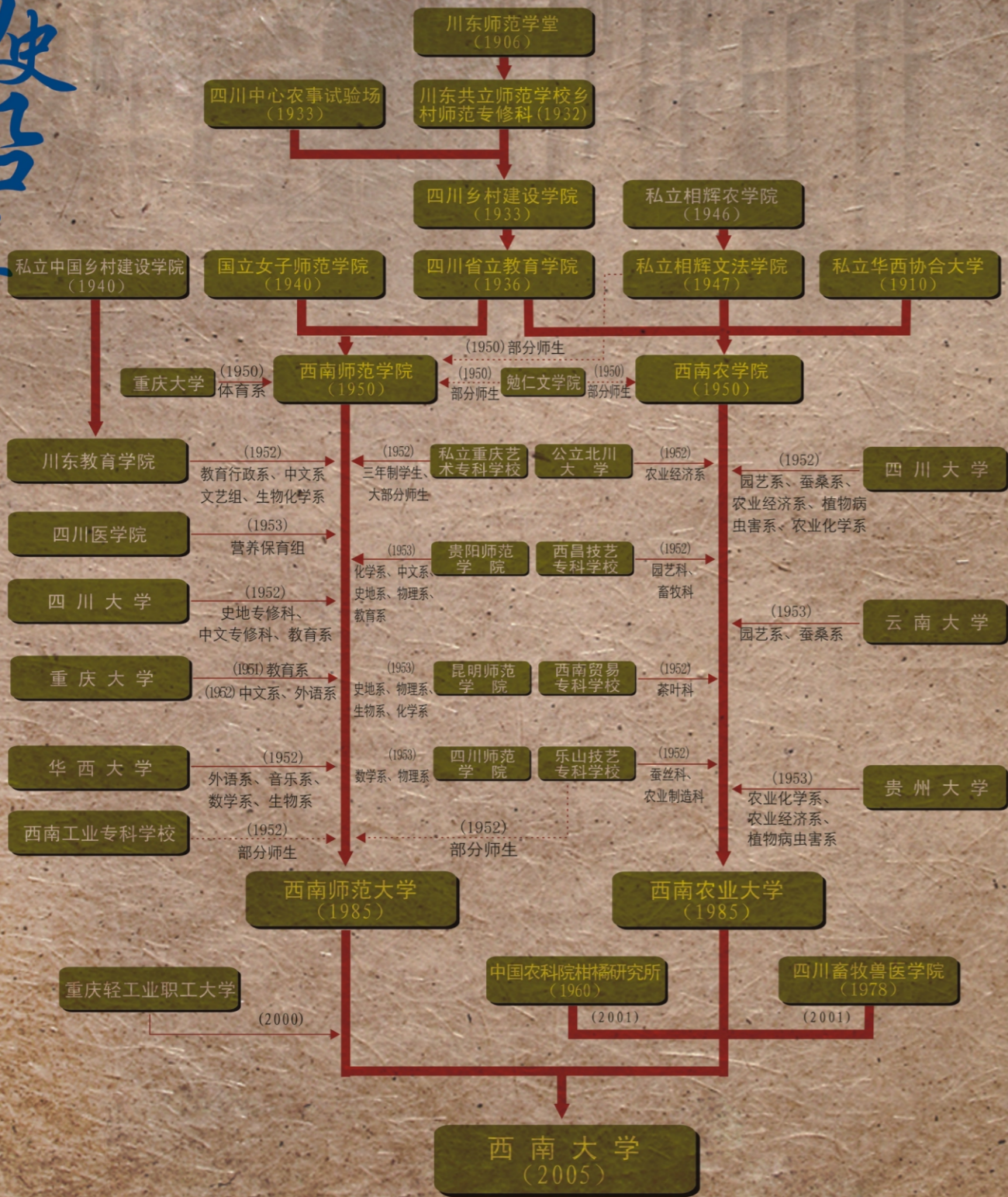




历史沿革
LISHI YANGE



西南大学记忆

名师风采

流誉海外，根扎神州
逢春便觉飘蓬苦



档案拾遗

档案中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校史校情

西南大学寻根（之八）
那段岁月中的侯光炯与土壤研究室

影像记忆

自办砖厂建家园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2010年第4期
（总第9期）

（注：2008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经广泛查阅资料，修订并完善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



1935年，从事乡建运动同仁合影于邹平。前右一一为梁漱溟，前左二为晏阳初



郭克^①作品《玉树琼花满目春》^②

^① 郭克，曾用名郭克宽，甘肃天水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西南大学美术系教授、中国花鸟画教研室主任、重庆国画院副院长、重庆书画研究院院长和重庆缙云书画院院长等职。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1018-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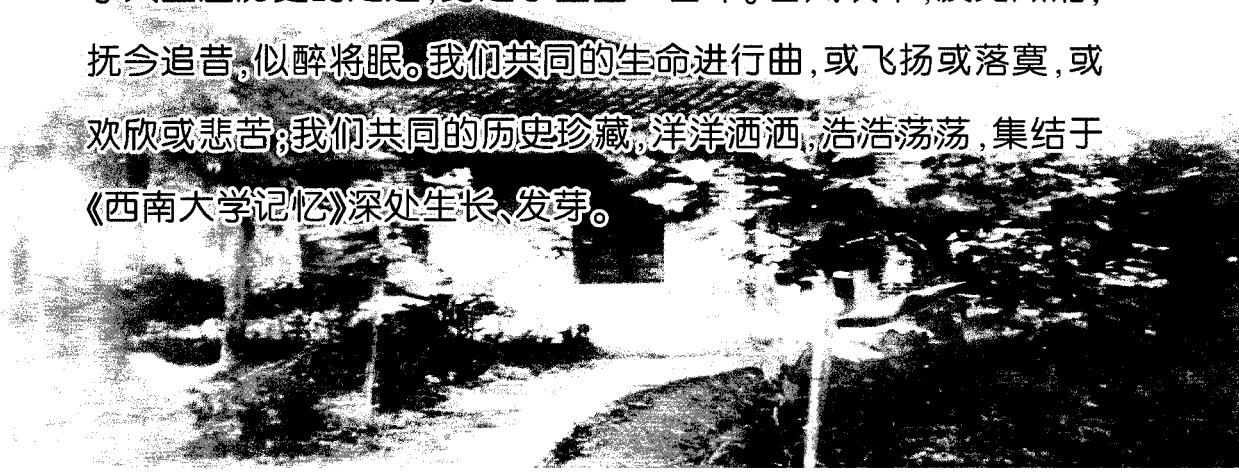
^②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86。

刊首语

□文/蒋涛

光影如梦里的花,记忆若雾中的纱,距离越远越飘忽不定。历史看似铁骨铮铮,冷若冰霜,却又常常缥缈悠远,捉摸不定。只有看见那些如梦如幻的光影的时候,我们的记忆才突然之间被勾起。历史的脉脉温情虽然让你觉得惬意,可你又总不会忘记那午夜梦回时历史的印痕,它处处无不透着人世的冷暖悲欣。历史亦是冰与火的相拥。

《西南大学记忆》历经两年的旅程,辗转穿行于记忆的长河,感受历史的喧嚣扰攘,感受记忆的色彩斑斓,感受千回百转的跌宕起伏,感受光影如四季般花开花落。仅仅短短的两年,西南大学人重温历史的足迹,跨越了整整一百年。古风吹来,波光潋滟;抚今追昔,似醉将眠。我们共同的生命进行曲,或飞扬或落寞,或欢欣或悲苦;我们共同的历史珍藏,洋洋洒洒,浩浩荡荡,集结于《西南大学记忆》深处生长、发芽。



西南大学记忆

2010年第4期(总第9期)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顾问：张跃光 丁忠民

李 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袁隆平

主 编：邓 力

执行主编：蒋 涛

副 主 编：李亚勍

执行编辑：王 贤

编 委：邓 力 潘 洵 蒋 涛

刘重来 李亚勍

编 辑：张晓华 郭 兰 姚 恒

马云飞 朱 林 朱文婉

唐朵朵 杜玫娟 姜海庭

韦雪贞

美 编：唐朵朵

校训：

含弘光大

继往开来



目

刊首语..... 蒋涛

名师风采

4 流誉海外,根扎神州

——记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 马云飞

15 逢春便觉飘蓬苦

——记晏阳初与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创立和发展 吴相湘

20 校史中的邵鹤亭 朱文婉

档案拾遗

21 档案中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校史校情

24 西南大学寻根(之八)

——西南农学院的发展(上) 张晓华

34 那段岁月中的侯光炯与土壤研究室 ... 李 兰 郭 兰

39 丹心向阳 奉献一生

——记李正清教授 刘重来

47 周总理究竟来过学校没有 李 兰 李亚勍

校友天地

48 张鲁哟张鲁 邓 力

录

西大地标

50 绿地上的第三十四教学楼 姜海庭

55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上第一个高级“宾馆”
..... 李 兰 李亚勃

57 校史求证 姜海庭

兼葭之声

58 宓园赋 秦效侃

影像记忆

60 自办砖厂建家园 王 贤 牟乔雅

校史论坛

63 文化:大学校史研究中的真谛 王列平

工作动态

68 档案馆举办“庆祝西南大学组建五周年档案馆部分藏品展” 张晓华

封面人物 晏阳初

封二 1935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同仁合影

封三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郭克作品

封底 西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 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 023-68367435
15923240270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367435

投稿邮箱: xdjy2009@126.com

邮 编: 400715

照 排: 重庆新综艺图文广告

记忆:

历史之基

智慧之源



流誉海外，根扎神州

——记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

□文/马云飞

编者按：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市人，原名兴复，字阳初，又名遇春，世界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历史学硕士，路易斯维尔大学法学博士。在美期间，曾受教于塔夫脱和威尔逊两位美国前总统。1918年赴法国战场，为华工服务，期间创办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工人报纸《华工周报》。1920年回国，决心以“推行平民教育彻底革新中国”为终身事业，从此踏上了矢志平民教育，献身乡村建设的人生之路。1923年在北平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任总干事，与陶行知合称南陶北晏。1926年，他以河北定县为实验区，开启了而后蔚为壮观的乡村运动的先河。在普及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继定县实验县之后，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实验区相继成立。1940年，他于重庆北碚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为乡村改造培养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1950年以后，他将中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事业推广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以“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为口号，指导推行田间实验与社区教育。1951年他组成了国际平民教育运动促进委员会，推动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在菲律宾的创建。他一生追求“天下一家”理想的实现，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60年，被世人尊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1938年，毛泽东就曾表示，对晏阳初“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1943年他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一起被美国、加拿大等上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成为惟一获此殊荣的亚洲人。1955年美国著名权威杂志《展望》评选他为当代世界100位最主要人物之一，赞扬他致力于农民生活改进的理想与精神举世无双。在印度的乡村工作者中间，人们将他称为“中国的圣雄甘地”；他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里根和布什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高度赞扬，并接受了菲律宾总统、泰国国王颁发的最高奖章；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特别顾问；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美国国会通过拨款条款的外籍人士；他被日本视为进一步现代化的路标之一；他的一生改变了全球上亿贫民的命运。本期《名师风采》收录了《流誉海外，根扎神州——记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及《逢春便觉飘蓬苦——记晏阳初与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创立和发展》两篇文章，分别介绍晏阳初的生平经历及其在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创办及发展过程中的教育事迹。

在逝去的 20 世纪的世界星空中,有一颗独具东方异彩的“教育之星”,是他,第一次将在中国土地上独立创建的平民教育理论与乡村教育体系推向世界。历经 40 余年的辛勤耕耘,他的理论与实践,开花结果。他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与褒奖,这位杰出的教育家就是晏阳初。



1982 年晏阳初在美国纽约寓所留影

辗转求学,渐生救国之志

晏阳初,1890 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在塾师兼乡医的父亲的教育下,他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谙习时势的父亲也深知“书香之外另有世界,西学乃潮流所趋”。因此毅然将少年晏阳初送到几百里之外的保宁府基督教内地会创办的西学堂接受新学。在这里他学习了算术、化学、物理、历史、地理、英语等现代科学知识,还接触到基督教文化,接受了洗礼。1907 年,晏阳初在保宁府西学堂毕业后升入成都华美中学,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

1913 年春,晏阳初在友人史文轩^①的支持下,以

名列榜首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前身是圣保罗书院)。按该校的规定,考第一名者,可获英皇爱德华第七奖学金 1600 美元,但奖学金只授予英国籍学生,学院院长索特建议他改入英国籍。晏阳初回答说:“这代价,要一个中国人来付,太高了。”他毅然放弃了这笔奖金,表现了一个中国人高尚的民族气节,就连当时圣保罗书院的校长巴奈特对此也深表敬佩。

1916 年,晏阳初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远渡重洋赴美国深造。他在美国获得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期间受教于塔夫脱和威尔逊两位美国前总统。这段时间的经历,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川中时,只有抽象的民主观念,到香港后,败国之民的羞辱,促进了民主意识的发生,我开始深切体会到国之重要,已有改造社会的愿望,再进而看到美国的繁荣,华裔工商的屈居人下,又回想到祖国的贫愚落后,我比较三种不同生活方式,孰高孰下,优劣如何……我不愿在中国的土地上再出现香港式的殖民地,苦难的中国需要解放,我立志贡献己力。”基于这些想法,他参加了中国留美学生的秘密组织“成志会”^②,青年们众志成城,思图救



晏阳初在香港大学读书时的留影
(图中前排坐者)

^① 史文轩,原名史梯瓦特(James Stewart)。1911 年夏秋之间,史梯瓦特当时在成都筹设一聚会所,类似基督教青年会,以文化娱乐活动辅导青年。时值与晏阳初相遇,他邀请晏阳初帮忙制订计划,将会所定名为“辅仁学社”,取“以友辅仁,以仁辅友”之意。后晏阳初给史梯瓦特赠了一个带有中国味道的名字——史文轩。(参见《走向民间的学人——晏阳初传(一)》)

^② 成志会,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该会以“众志成城,拯救中国”为宗旨。与晏阳初同期的会员有王正廷、王宠惠、张伯苓、孔祥熙、周作民等人。(参见《走向民间的学人——晏阳初传(一)》)

国。当时正值美国排华运动加剧,许多华商一到美国就被拘禁,即使久居美国的留学生和华侨也常被无理拘留。眼见这些不平之事,晏阳初心里既气愤又难过。为表示对美国政府排华政策的反对,他以“从美国宪法论排华的不合理”为题,参加了耶大的演讲比赛,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深切的爱。

投笔从戎,服务华工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0万华工(苦力)被送往欧洲,在各战场帮助修建工事、运输物资等,为了管理这批语言不通的劳工,美国陆军青年会在美国各大学招募留学生充当翻译,时值晏阳初毕业,他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毅然投笔从戎,在毕业典礼的第二天便跨过布满鱼雷的大西洋,来到战云密匝的法国。在法国,晏阳初被分配到布朗华工营战时临时商店充当售货员兼翻译,与华工朝夕相处。在此期间,晏阳初发现他们不但勤劳朴实,而且有着非凡的热忱与智慧。只是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才陷入贫困与无知,沦为被欺凌被奴役的对象。华工营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哪来强大的祖国!于是他在华工营中试办起了他平民教育生涯中第一个识字班。他选择一千个最常用的汉字,边编、边教,开始训练华工识字。这项活动,受到陆军青年会的支持,并吸引了当时在巴黎留学的许多中国学生参加,使办学规模逐渐扩大。林语堂^③即是其中之一。

随着识字华工文化程度的提高,晏阳初创办了《华工周报》,他亲自为《华工周报》撰文,其中《革心》一文最重要,它可说是晏阳初一生努力目标的第一次公开披露,也是他首次将“三C”——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苦力(Coolie)合在一起。儒家的豁



1918年晏阳初(右一)在法国华工营

达、耶稣的博爱和对“背二哥”^④的同情融为一体,道出了他一生持之不辍的信念。比较具体地说就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华工周报》也成为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工人报纸。当时,在巴黎找不到汉字印刷设备,只得自己编排,用照相制版印刷,报纸很受华工欢迎。

《周报》发行数月后,晏阳初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大意如下: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的太便宜了,只十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三年的积蓄,365个法郎。华工们辛勤劳动,只有微薄的收入,但竟肯用三年的积蓄支持这张小小的报纸!这笔积蓄是冒死赚的血汗钱啊。目睹华工们动人的义举,晏阳初深受感动。他说:“我在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

^③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萨天师等。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赴美国哈佛留学,后又到德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著有《语言学论丛》、《逃向自由城》、《语堂文集》等多部著名论著。(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436页。)

^④ 背二哥,巴山地区,交通不便,人们所需物资全靠人力背运,从事这种艰苦背运职业的人便被当地人称之为“背二哥”。(参见《走向民间的学人——晏阳初传(一)》)

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他们的智力和热诚,渐渐引导我发现一种新人。这新人的发现,比考古学家发现北京人,也许还要重要。”

数千年来,这种人被认为是没脑筋的人,没有时间读书,也没人教他们。自此而后,他立志不做官,也不发财,要把“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他发出感人肺腑之言:教育劳苦大众,是一种使命,也可以说是教育的革命,我要为这革命而出家,就是抛弃荣华富贵。劳苦大众所需要的,不是脑筋,而是机会,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通过办学与办报,他确定了自己一生的方向。

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

一年的服务期满后,晏阳初决定回美深造,并矢志终生为苦难同胞服务。1919年6月,晏阳初返美,入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历史学,他希望通过历史中获得政治经济种种演变的真相。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恰值此时,晏阳初接到长兄来信,告知母亲生病。情急之下,他决定提前回国,1920年7月,晏阳初满怀推行平民教育的决心启程回国。

(一)创办平民学校,开展平教活动

1920年,晏阳初回到祖国,在北京成立了“大众教育联合会”,首倡扫盲运动,他用了一年时间深入乡村,考察平民教育情况。经过调查,发现在中国举办平民教育有三大困难。第一是“穷难”——老百姓贫穷,一天到晚忙于生计,没有钱支持他们去受教

育;第二是“忙难”——他们终日忙碌,没有多余时间接受教育;第三是“文难”——中国文字难认难写。解决“三难”的对策,就是举办经济的(以最少的金钱,收最大的效益)、简单的(以最短的时间,获最充分的知识)、基础的(授与最适用的读写技能)民众教育。因此,平民教育的第一阶段工作,就以识字运动的姿态出现了。首先是“选字”,晏阳初前后动员了50多人,搜集当时民众日常使用的有关文件以及白话文书刊,如小说、戏剧、民歌、帐簿、文契、告示、街名、商店招牌等等,共搜集了150万字材料。统计每个字出现的次数,选取出现频率较高的字,确定为常用字。再从常用字中筛选出出现频率最多的字1000多个,作为基本字。其次是编教材。初步编出白话文课本《平民千字课》二册,以供急需。这成为了中国近代教材史上的新篇章。再次是选定地区实验试用。第一个选定的地区,是湖南的长沙。

1922年,晏阳初到长沙,同一批知识分子先后办起了600多所平民学校,提出了“扫文盲,作新民”的口号。长沙的扫盲教育四个月一期,利用早晚上课,受教育的学生总计有5万多人。当时,青年毛泽东便是100多位义务教师之一。继长沙之后(1922年至1923年),晏阳初还先后在烟台、南京、杭州、嘉兴等地开展了识字运动,并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开展了平教活动。他编辑了市民千字课、农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等通俗语体课本。一时间,大江南北大中城市,平民识字运动蔚然成风,成千上万的男女民众涌进了平民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著名社会人士熊希龄^⑤、梁启超^⑥、胡适^⑦、陶

^⑤ 熊希龄(1870-1937),湖南凤凰人,字秉三,光绪进士。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力倡新政和新学。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辛亥革命后,任袁世凯政府财政总长、国务院总理、参议院参政。1917年任段祺瑞政府行政院长。后从事社会慈善事业,曾创办香山慈幼院。(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7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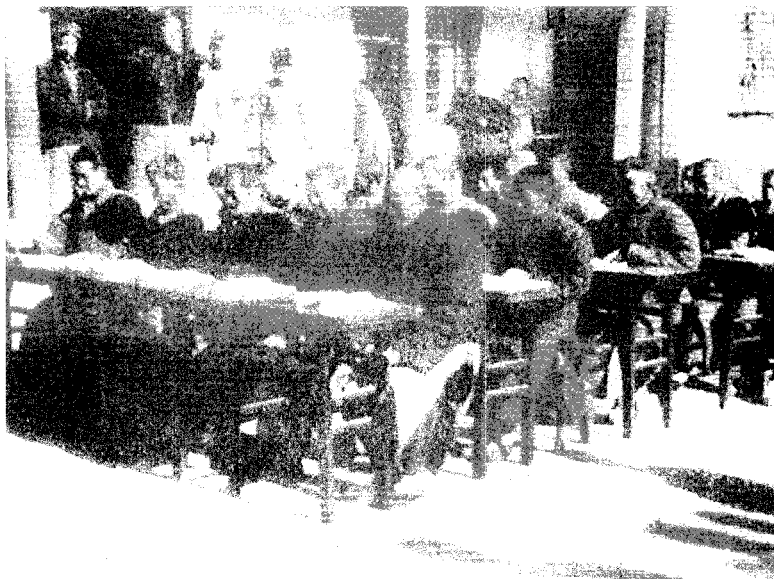
^⑥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光绪举人。1890年起从学于康有为,1895年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参加强学会。1898年参与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1913年初归国,任共和党党魁。后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1916年曾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新文化运动时期,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开白话文风气之先(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650页。)

^⑦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初名词廛,原名洪骅,字适之。早年就学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先入康奈尔大学学农科,后转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从1916年起提倡文学改革。获博士学位后于1917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力倡新文学运动,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后主张考据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界极有影响。(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501页。)

行知^⑧、蒋梦龄^⑨等也积极参与其间。为适应全国范围内兴起的平民教育运动的需要，亟需成立一总的领导机构加以协调与推动。1923年8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西郊清华学校，由朱其慧^⑩主持召开成立会议。晏阳初致词，阐述平民教育之宗旨、真义、要领。强调平民教育“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教育事业，且系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平民教育事业”。会议通过简章，宣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正式成立。选举朱其慧为总会董事长，陶行知为董事会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主持工作，张伯苓^⑪、陈宝泉^⑫、朱经农^⑬、胡适、周作人^⑭等均为董事会成员。

1925年6月，晏阳初作为中国民间代表出席了在檀香山召开的太平洋沿岸国民会议，旨在探索太平洋地区穷国富强的道路。在会上，他就平民教育运动作了一次专题演讲，引起了与会者强烈反响，檀香山华侨为之掀起热烈的捐献活动。

梁启超曾作《新民说》，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晏阳初无疑对这句话有颇深的印象，他说：一切问题自人而生，欲求问题的解决，自当在人身上来下功夫。所以平教会自始至终，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授课

都把“做新民”作为目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女士曾在《告语人民》的结尾呼吁：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晏阳初及其同事制定的实用的计划的确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⑧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1914年赴美留学，1916年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系主任。后参加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从事平民教育和教育改良运动。（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604页。）

^⑨ 蒋梦龄(1866—1964)，浙江余姚人。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早年入天主教会学校，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赴美国留学，1917年获博士学位。不久回国，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18年创办《新教育月刊》，1927年出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校长，193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对文学艺术、史学经学、文字训诂均有研究。（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668页。）

^⑩ 朱其慧(1876—1931)，字淑雅，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早年协助丈夫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及中华改进教育社。1923年曾在北京参加发起创立中华平民教育会，任董事长。1925年发起组织中国妇女协会，并任委员长。后曾创办女子平民工厂。（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⑪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原名寿春。1891年入北洋水师学堂。1904年创办敬业学堂。1917年赴美留学。1919年秋创办南开大学。（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361页。）

^⑫ 陈宝泉(1874—1937)，字筱庄，天津人。早年入日本宏文学院学习，毕业归国后任学部郎中。1912年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3年7月至12月兼代教育部次任北京教育会会长、天津教育会会长。1928年后任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参事、河北省政府委员等职。（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409页。）

^⑬ 朱经农(1887—1951)，原籍江苏宝山(今属上海)，生于浙江浦江。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回国，曾参与创办中国公学。1916年又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1921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3年去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⑭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本名槐树，后改槐树、遐寿，字启孟、启明，号知堂，笔名岂明、药堂、仲密等。1906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建国后从事翻译工作（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466页。）

(二)身先士卒,博士下乡

在城市平民教育取得成绩之后,他进一步深思:中国向来以农立国,80%的人口居住在乡间,农村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与重心。中国外有列强侵略,内有战乱,要救济中国,必先救济乡村,要建设中国必须先建设乡村,这需要掀起一场深刻的乡村改造运动。乡村运动将肩负起“民族再造”的使命。

1929年秋,晏阳初出任河北县政研究院院长,他正式将平民教育总会办事处迁至河北定县。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将自己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志转化为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改造农村社会、解除农民疾苦的实际行动之中。晏阳初夫妇携三子二女举家迁往河北定县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在晏阳初一心为平民的真诚情感和崇高献身精神的感召下,数以百计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瞿菊农(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陈筑山(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美国哈佛大学戏剧博士)、冯锐(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博士)、傅保琛(美国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郑锦(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孙伏园(北京大学教授)、陈志潜(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汤茂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刘拓(美国艾阿华大学博士)、姚石庵(北平商业专科学校校长)、李景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谢扶雅(广州岭南大学教授)、陆燮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等海外归来的博士、硕士,他们纷纷放弃了都市中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举家前

往偏僻艰苦的定县,加入了乡村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行列。这一被称为“博士下乡”的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他们希望能通过定县这个“社会实验室”为中国的广大农村与整个社会摸索出一条自强自救的建国方略。

在乡村建设实验中,从定县翟城村开始,继而以区为单位,最后推广到全县。十年间,平教会在定县推广农业优良品种(如棉花、波支猪、来亨鸡、安哥拉兔等)、办理信用合作社、兴建农场果园、开办城乡平民学校、编辑农民通俗读物、组织戏曲演出队、设立广播电台、建立卫生院和村保健站、开展巡回医疗和推广节制生育等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定县时期的平民教育,其范围已扩大到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晏阳初认为,要医治中国的广大平民,特别是农民的“贫、愚、弱、私”四大病症,就必须对症下药,以生计教育医贫,以卫生教育医弱,以文艺教育医愚,以公民教育医私。采用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方式全面推动平民教育。

定县的实验虽局限于一隅,但其影响却远播全国,乃至全世界。国内外的一些名流、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如斯诺^⑤、赵元任^⑥、张君勱^⑦、林宰平^⑧等到定县来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均对定县实验的成绩加以称赞。1932年夏,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阿莫德到定县参观后向美国国会写了一份长篇报告,称“这是在文明古国四万万万人里正开展的一项最重要而且具有很大推动力的运动”。1938年5月,平教总会干事堵述初前往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汇报

^⑤ 斯诺(1905—1972),美国人。1926年密苏里大学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1927年起从事新闻工作。1936年访问中国陕北根据地后,写成《中国上空的红星》(即《西行漫记》)一书,向美国和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工农红军的长征。(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803页。)

^⑥ 赵元任(1892—1982)原籍江苏武进,生于天津,字宜重。1915年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学校。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先后任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校教授。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在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方面造诣很高。(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页。)

^⑦ 张君勱(1887—1969),原名嘉森,号立斋,江苏宝山(今上海宝山)人。1906年留学日本,并参加政闻社。辛亥革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后留学德国。1916年3月回国。长期从事唯心论哲学的教育和研究,被称为“玄学鬼”。1933年4月组织国家社会党。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页。)

^⑧ 林宰平(1879—1960),名志钧,字宰平,号北云、唯刚,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政、经济学,与沈钧儒、陈宗蕃(莼衷)同科,二三十年代,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经济系讲师,1932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讲师。有《帖考》、《林宰平先生书画集》和诗集《北云集》等行世。

平民教育运动的相关情况并听取有关组织民众的建议。期间毛泽东对晏阳初与平教总会的其他人员,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并且热切期望平教会继续做积极的推广工作,希望能有几千万的优秀干部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平教会的朋友。毛泽东对平教会的评价与鼓励,更加坚定了晏阳初与平教会对平教事业奋斗不息的信念。

兴办乡建学院,倡导自由民主

由于日本侵华,定县实验被迫中止,平教会辗转迁至湖南长沙、衡山,最后撤至四川。一面组建培训农民抗战教育团,一面继续开展“县单位”与“省单位”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实验。1936年至1937年初,湖南、广西、四川分别设立“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并选定湖南衡山、广西宾阳和四川新都三县为实验县,平民教育运动在这些地方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向周边地区扩散。

由于各地乡村改造工作的全面展开,晏阳初大

感人才的缺乏。尽管平教总会高级人员奔走各地,仍有照顾不周之处。而且,他想到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争蹂躏的广大农村急需大量的乡村工作者来从事战后重建工作,因此,建校育人,已成燃眉之急。晏阳初与许多热心人士共同策划,拟筹备一所正规的全国性的培养乡村改造人才的高等学府。于是组成筹备委员会及董事会,张群^⑩为董事长,晏阳初为秘书,董事有甘乃光^⑪、周作民^⑫、卢作孚^⑬、范旭东^⑭、梁漱溟^⑮、黄炎培^⑯等。经过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中国教育史上



晏阳初(右一)与张学良合影

^⑩ 张群(1889—1990),字岳军,四川华阳(今双流)人。早年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8年留学日本,同年加入同盟会。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重庆行营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1947年后任行政院长、重庆绥靖公署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参见《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页。)

^⑪ 甘乃光(1897—1956),字自明,广西岑溪人。1922年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1924年夏在黄埔军校任英文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青年部部长。1927年9月,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候补委员。1932年任内政部政务次长。1938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⑫ 周作民(1884—1955),江苏淮安人,原名维新。1902年赴粤,入广东公学就读,1906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1913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466页。)

^⑬ 卢作孚(1893—1952年),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保路运动。五四运动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5年集资创办民生实业公司。后任国民党政府川江航运管理处处长、四川省建设厅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次长。(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⑭ 范旭东(1883—1945),湖南湘阴县人,出生时取名源让,字明俊,后改名为范锐,字旭东。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1901年赴日本留学。1912年任职于南京临时政府工商部。1913年赴欧洲考察。1914年归国筹设公司及工厂。1938年6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见《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页。)

^⑮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1917年后,应聘于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1924年辞去教职,到山东自办教育,从事乡村建设。曾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文集》及《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653页。)

^⑯ 黄炎培(1878—1965),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江苏省议会议员。1915年赴美考察,回国后于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其后又办了职业指导所、补习学校、乡村改进社等。著有《延安归来》等。(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617页。)

第一所为乡村改造培养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于1940年10月28日开学，由晏阳初任校长。校址选在重庆西北巴县的歇马场，占地500余亩，另有60公里外合川县乡绅所捐土地。1945年8月，经当时的教育部正式批准，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更名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确认了农村改造与发展的高等人才培养机构的地位。

学院“以整个国家建设之计划、抗战建国之任务”为培养人才的目标。系科的设置以培养针对解决“愚、穷、弱、私”四大病症的专门人才为标准，分别设乡村教育系、农学系、农田水利系、社会系。并设研究生委员会，马寅初^②、费孝通^③和老舍^④先后成为该校客座教授，1945年10月开始上课。晏阳初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办学方针，以民主自由为治学指导思想，倡导民主进步，团结互助，勤学奋发，艰苦朴实的校风，提倡学术自由，允许学生自由出壁报、组织社团、进行学术研究、组织各种演讲会、讨论会，允许进步教授讲新经济学（即《资本论》）、新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课程；他支持师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7年“6·1”大逮捕，乡建院有34位师生被逮捕入狱，为此他积极进行营救，通过张群、孙元良^⑤，分批把大部分师生保释出来。当时的“乡建学院”被称为“民主自由的园地”、“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正如晏阳初所称，是一块“干净土”。晏阳初在对学生的讲话中强调：“你



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学生合影

们应当达到具有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知识、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者的气魄、宗教家的精神这六个方面，才算是人才，才能担负起历史赋予你们的重任。”学生管理权归学生自己，实行自习、自治、自给、自强，学校民主空气浓厚，拒绝国民党、三青团的渗透。

1943年5月美国、加拿大、南美各国及墨西哥的几百所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发起“全美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同时借此表彰在当时发扬哥白尼精神、为人类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大会由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哈洛·沙普列博士主持，这份“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是经过几个月广泛地征求提名和酝酿推选出来的，其中包括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汽车大王亨利·

^②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在北京大学先后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教务长，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等。后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抗战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著有《新人口论》、《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③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1928年入东吴大学，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毕业，并取得公费留学。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1944年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参见上海大学校报电子版第567期(2009-02-18)第04版费孝通生平介绍。）

^④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1913年入北京师范大学。1916年任方家胡同小学校长。1923年任北京教育会文书。1924年夏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1934年任山东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讲学著有《大明湖》、《猫城记》、《骆驼祥子》等。（参见《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⑤ 孙元良(1904—2007)，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37年8月，升任第七十二军军长。1939年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著有《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回忆录)、《世界军事史》。（参见凤凰网《103岁抗日名将孙元良：最后的黄埔一期生》http://news.ifeng.com/history/1/renwu/200806/0621_2665_609772.shtml。）

福特、“米老鼠与唐老鸭”之父华尔特·迪斯尼、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但最年轻的却是一位东方人,而且是唯一的东方人,他就是晏阳初。在对晏阳初的表扬状上写道: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使之易读易写,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您又是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

为筹措用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资金,1946年3月他与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到达白宫见杜鲁门总统,表述平民教育的意义,经过讨论和说理,最后经杜鲁门的提议,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叫晏阳初条款的议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外国人促成的国会拨款条款。法案规定:四亿二千万对华援助总额中须拨付不少于百分之五、不多于百分之十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4月17日,晏阳初自美回国,回到乡村建设学院,与平教总会同仁会商后,决定扩大规模加强乡村建设“领导人才”训练。

晏阳初初创平教总会时即着眼服务于全人类,而以中国为起点。随着中国平民教育的全面推展,经验积累日多,其运动目标与口号也有发展变化。

初创时的“除文盲,作新民”,渐渐演变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当荣获“世界革命性伟人”称号后,其责任感使命感有了新的提升。他的警世恒言,再次赢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赞誉。这就是1943年他曾在《读者文摘》上针对美国总统罗斯福“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



1943年5月晏阳初(右)与爱因斯坦(左)等被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时,与主持人沙普列博士(中)合影

惧的自由)之不足,提出第五项自由——“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的观点。认为“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的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并参加自己的建设工作,否则世界将没有和平可言”。大法官道格拉斯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赛珍珠女士还特地请晏阳初介绍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方法和心得,撰成了《告语人民》一书,强调全球三分之二的人都为文盲、疾病、饥饿、虐政所苦,必须将中国平民教育经验推行世界各地。1945年联合国正式成立,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基本教育计划就是渊源于此。

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

1950年以后,晏阳初在中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实验被迫终止,他旅居美国受聘为“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他将自己的事业转移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以定县实验的基本经验与中国平教与乡建的理论为基础,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继续为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奔走,指导推行田间实验与社区教育。这时,他一直以“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为目标。1967年5月,“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在马尼拉南郊成立,晏阳初要在这里培训各国乡村建设人才,将四十年珍贵丰富的乡村改造经验贡献给世界各国,他说: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又一项新贡献。40年来,它已为91个国家、2500个组织培训了9000多名乡村改造的领袖人才。今天,世界乡村改造运动正以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为中心,与分布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的乡村建设会形成了一个网络,不断交流经验与技术,推动第三世界的乡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不断前进。

1955年他被美国《展望》(look)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国际舆论给予他崇高的评价,称赞他是“具有坚定信念与丰富想象力的英勇学者,是劳苦平民心智与精神的解放者”,是“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真正的哲学家与人道主义者”。赛珍珠称颂他“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

菲律宾总统、泰国国王都把自己国家的最高荣誉奖章颁发给了晏阳初,以表彰他对各自国家所作的杰出贡献。1987年10月美国总统里根在总统办公室授予晏阳初终止饥饿终生成就奖。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



1966年晏阳初(左三)视察哥伦比亚乡村

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垂暮之年,仍心系祖国

随着时间的流逝,晏阳初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除了关注美国新闻媒体中有关中国的消息外,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站在窗前,望着异国的星空,

情不自禁地低吟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以此来寄托他对祖国的怀念,他说:“尽管我是四海为家,有时午夜梦回,难免乡思万缕。……尽管最近三十多年来,我常用英语,偶用母语,仍乡音未改。记忆中的故乡,随着我环绕天涯。”

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跨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面临着百废待兴、广揽各方力量共同建国的新局面。1983年夏,欧美同学会^①在有关方面的关照下写信给他,邀请他回国访问。早在邓小平访美时就曾关心过晏阳初在海外的行止。希望他早日回国观光,并指示有关方面尽早做好欢迎他的工作。1985年8月,在阔别祖国45年之后,晏阳初应邀回国访问考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等接待了他,并对其一生从事中国与世界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给予了积极评价和正面肯定。茅以升^②、严济慈^③、胡子昂^④、费孝通、薛暮桥^⑤、

^① 欧美同学会,1913年10月由顾维钧、梁敦彦、詹天佑、蔡元培、颜惠庆、王正廷、周诒春等人共同发起,联合京津两地的留学归国学人在北京创建的民间团体,宗旨是继承爱国主义的传统,团结留学欧美等国的归国同学,并广泛联系海外人士。

^② 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1911年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1919年获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2年后,任教育部部聘土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198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著有《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力学概论》等。(参见《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3页。)

^③ 严济慈(1900—1996)字慕光,浙江东阳人。1923年东南大学第一届唯一毕业生。1923年后,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获数理教学硕士、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27年任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参见人民网《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http://shuangbai.people.com.cn/GB/158147/158496/9536226.html>。)

^④ 胡子昂(1897—1991),重庆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历任巴县中学校长,重庆市教育局局长,重庆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1942年2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46年任重庆市参议会会议长。(参见《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64页。)

^⑤ 薛暮桥(1904—2005),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2年在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作有通俗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培训新四军干部的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体改委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2005年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参见人民网《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之薛暮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2020/74689/113951/6742430.html>。)

名师风采

陈翰笙^⑤等几十位各界名流与晏阳初欢聚一堂,共叙旧情。原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同事学生们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1987年7月晏阳初再次回到中国访问,抱着“余年为祖国做点事情”、“为中国大陆和海外侨胞的友谊、为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农村的改革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的心愿,与重庆社会科学院共同拟订了建立“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的初步方案。在这次回国中,中国欧美同学会特别为他举行了欢迎会,并推选他为欧美同学会海外名誉会长。此后不久,由中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一起策划的“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预定1990年的5月末在北京召开。令人遗憾和悲痛的是1990年1月,晏阳初整整走完了他一百年的人生历程,在美国纽约逝世。他的逝世,使许多渴望与他一见的海内外与会者感到遗憾。而对于晏阳初来说,令他遗憾的是期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多做点事的愿望未能实现。1997年,晏阳初魂归故里,静静地安卧在古塔山侧,一座汉白玉雕像,永远带着微笑,安详地注视着脚下深情的故土。



1985年晏阳初回国时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的亲切会见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所用照片均来自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jamesyan> 及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晏阳初研究网 <http://www.jamesyan.net>.)

参考文献:

- [1]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1.
- [2]宋恩荣.晏阳初文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 [3]走向民间的学人——晏阳初传(一)、(二)、(三)、(四)、(五).参见《晏阳初文集》及《晏阳初及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作者宋恩荣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ongenrong>.
- [4]深切怀念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晏阳初、黑暗世界“点灯人”——伟大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人生为一大事来:——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乡村建设活动大事记.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jamesyan> 及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晏阳初研究网 <http://www.jamesyan.net>.
- [5]巴中人的骄傲: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参见共青团巴中市委网站 http://www.bzqqt.cn/News_view.asp?ID=310.
- [6]朱媛美.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J].民办教育研究,2006,(5).
- [7]晏鸿国.晏阳初先生生年考[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 [8]薛伟强.晏阳初研究八十年[J].河北学刊,2006,(2).

(责任编辑 李亚勃)

^⑤ 陈翰笙(1897—2004),江苏省无锡人。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34年后,在纽约任《太平洋季刊》副主编。1939年回到香港,主编《远东通讯》,并帮助宋庆龄等创办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主要著作有《美国垄断资本》、《印度莫卧尔王朝》、《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中国农民》、《四个时代的我》。(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著名学者陈翰笙生平简介 http://www.cass.net.cn/y_09/y_09_01/y_09_01_09.html。)

逢春便觉飘蓬苦^①

——记晏阳初与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创立和发展

□文/吴相湘

想方设法建立乡村建设学院

晏阳初于“平教总会”成立之初,认识到首先急务是培养人才。即使在日军威胁华北的情势下,也不曾忘记须臾。1936年,乡村建设育才院在河南定县开学。翌年三月,各所研习生南下湖南衡山实习,不幸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爆发,“育才院”未能继续办理。“平教总会”举全部人力物力协助国民政府及湘、赣、川三省进行改造。工作愈发展,人才却愈感缺乏。“总会”高级人员奔走各地,时有照顾难周之处;中级初级人员需要众多而且急迫,却又无法觅得。1940年春,晏阳初开始积极筹备新创乡村建设学院,以之为一全国性培养乡村改造人才的高等学府。

当时,国内各乡村机构,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都被战火而不能继续进行。工作人员南下,先后参加“平教总会”协助县政改造^②。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改组扩大为全国乡村建设学会。晏阳初被推举为理事会主席,兼附设的育才委员会主席,仍旧是“平教总会”干事长。当准备创办这一个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学院时,晏阳初为了表示“天下为公、团结乡村工作



晏阳初

人士”的意旨。特先将这一计划提交教育委员会讨论,一致赞成后,再送请理事会(梁漱溟等任理事)审议通过,才开始积极进行。旋即邀请热心支持“平教”的人士张群、甘乃光、陈光甫^③、周作民、卢作孚、康心如^④、范旭东、梁漱溟、梁仲华(前河南省地方自治学院院长)、高阳^⑤(前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晏阳初等为董事,组成一坚强且具有代表性的

^① 该句为唐代无名氏所作的《杂诗》中的颔联。全诗为“花落长川草色青,暮山重迭雨冥冥。逢春便觉飘蓬苦,今日分飞一涕零”。

^② 县政改造,即一种县政改革运动。

^③ 陈光甫(1881-1976),江苏镇江人,原名辉祖,后改辉德,字光甫。1909年留美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总经理、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理事、行政院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参政会参议员、国民政府委员和立法委员等职。1915年在上海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3年8月在银行属下成立旅行部,开展旅行游览组织接待服务。1927年6月将旅行部改名中国旅行社。

^④ 康心如,金融家。其它不详。

^⑤ 高阳(1892-1943),即高践四,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留学美国,曾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是我国近代史上享有盛誉的乡村教育家。

董事会。公推张群为董事长、晏阳初为董事会秘书，并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院长。

寻觅地址是建校的首要工作，几处勘查比较后，决定以巴县歇马场(乡名，即现在的重庆北碚区歇马镇)为校址，距战时新聚成的文化中心

北碚及青木关都只有十余公里，复旦大学、江苏省立医学院、教育部等分布在这两地。校址所在地有山水景色及四川省最著名的瀑布点缀。但战时土地居奇，极难获得地主同意出让。嗣经四川省政府协助，当地士绅的合作，经八个月的努力，才取得约五百亩土地。而建筑工人工资高昂，且难觅雇。几经周折，雇得苦干工人，不幸开工未久，多染疟疾，且日军飞机空袭不已，建筑工人也有被炸伤亡的，以致工程进行缓慢。1940年10月28日开学时，只完成房屋一栋。物价、工资却仍不断上涨，原来预算建筑费法币九万元，实际支付二十万元，却只完成房舍四栋及两所房屋的一部分。

晏阳初等在选觅校址时，董事会各董事即分途向各方募捐。国民政府首长及闽、粤、桂、湘、浙、赣、川、陕等省政府都慷慨赠金，协助这一乡村改造人才培养所早日成立。四川合川县三乡绅拥有五万亩左右土地，志愿捐赠若干以赞助乡村学院。晏阳初特邀专家同往访问，认定这一区域是种植茶叶、烟草、玉蜀黍、马铃薯的良好地方，距离歇马场校址约六十公里，其中三十公里已经被一煤矿公司建筑铁道，其余三十公里也在其他煤矿公司商议兴建中。1940年12



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宿舍

月，这三位乡绅正式将土地一百平方里赠予“平教总会”。晏阳初当即请董事会中的企业家与中国茶叶公司及西南建设委员会合作采取迅速步骤，以开发这一地区。企盼几年以后，不只是乡村学院农科学生有一有效率的训练场，同时农产收入可增加“平教

总会”经费的来源。

中国盛行“科员政治”，即各行政机关高级人员不愿自作主张，一切必须由基层人员查照成法办理，绝不创新适应时势需要。所谓“此例不可开”，几乎是一般机关拒绝任何新事物的口头禅。当晏阳初将“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各项计划送陈教育部请求立案时，就遭遇到这样的难关，教育部长陈立夫^⑥与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非常赞成这一乡村建设的工作与培养乡村人才的新观念，但主管审查的人始终坚持“于法无据”。经过长时间的会议与辩论，陈立夫、吴俊升决定作例外的批准：先设乡村教育、农业、农业经济三专修科，是初级学院。1945年8月才正式准许扩充为独立学院(按《大学法》规定：至少须已设立三个学院，且内有若干学系。才可用大学两字名称，如只有若干学系则为独立学院)，改名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

克服种种困难正式开学

教育部批准创校以后，“育才院”即进行招生，分别在陕西城固、云南昆明、贵州贵阳、湖南衡阳、广西

^⑥ 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名祖燕，号立夫。陈果夫弟。北洋大学采矿系毕业，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1925年9月返国，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曾长期主持国民党人事及组织工作。与其兄陈果夫组织中央俱乐部(即CC)，以控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是国民党CC系首领之一。1949年去台湾。

桂林及四川成都、北碚、大竹、南充、泸县、江津十一地点报名考试,以便有志乡村青年就近参加。原定录取一百五十名。嗣以建筑校舍工程迟误,无法容纳。尤其是年(1940年)4月20日,“平教总会”遭遇成立以来空前巨大的人才损失。原定计划必须改变,只录取最优秀的五十人——这五十人来自十一个不同省区。三分之一的新生都有高中毕业学历且具备在国民学校、农场、平教活动、为伤兵服务等各种不同经验二三年。晏阳初为此特别慎重:“育才院”开创,必须重质不重量。

1940年10月28日,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正式开学,晏阳初亲撰《乡建生力军歌》。专修科分二系:农村教育、农业教育,旨在培养县单位乡村建设的行政与技术人才,学生都是高中或高师、高农毕业并有一二年的工作经验。入学后第一学期是共同课程,第二学期是专门科目,第三、四学期完全是实习,暑期不放假,由学校按计划分别派往农村参加乡村工作。农村教育系专门科目分别为成人教育及儿童教育组,农业系分植物生产、农业经济二组。学生除受课及实习以外的日常生活,如体育活动、军事纪律、学校卫生、膳食管理一律由学生主动自治。这是与其他各大专学校完全不同,经政府特



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成立后,第一次奖学金获得者合影

试行的。同时院方又鼓励培养“师生一体”的精神:上课实习之余,全院教师十五人分组(每组有学生六人)担任每一学生的个人顾问,每两周轮流与学生作非正式的聚谈,了解其过去经验及个别有关问题,加以鼓励与启发。当教师与学生个别谈话不举行的那一周,晏阳初院长宿舍就开放给全校学生自由访问,除几项社交性活动以外,晏与教师们就和学生自由聚谈,叙说各人以前读书求学生活以及近年情况。每周土曜日^⑦,每一学生将一周活动的感想和心得写成文章送陈其个人顾问教师,并在次周与顾问教师聚谈时讨论。这样,师生间得深切了解且建立真诚情感。这样“育才院”就成为了一大家庭。

蒋介石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时,指定璧山县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作实习的实验县。姚石庵^⑧未遇难前,曾作详细查勘。经晏阳初等决定即以璧山县境的来凤驿(市镇名)为主要中心,开始调查与实验,进行方向着重于社会改造。也就是自乡村基层入手,和其他实验县着重自上而下的政治建设不同。采取“组织教育”制以结合学校与社会,也就是学校课程与社会建设项目的密切配合,“学生体”不只是学龄儿童,还包括全全村居民(文盲及已受教育的男女),都向乡村改造的共同



“人间剧社”在校内和儿童福利院上演“升官图”剧照

^⑦ 即星期六。

^⑧ 姚石庵(1898—?),山西省徐沟县人,卒年不详。农业经济学家。早年先后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和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教育事业上工作多年。著有《农民生计教育》、《农民生计训练与县农业推广制度》、《县单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经营》等。

目标努力。学生是教读人,也是学习人,高年级的教低年级的,识字的教文盲。这是一节省时间、金钱与教师人力而在短期间能教全村居民的最佳方法。来凤驿从此成为组织教育的模范市镇,“育才院”农村教育系师生在此出力极大。中央教育部表示给予政治与财力上的支持,使这种组织教育发展更完善,以来凤驿作为“组织教育”教师与工作人员的训练中心。

来凤驿组织教育的一大成果,即任“育才院”农村教育系瞿世英^⑨与“育才院”研究部毕业生徐幼治(女)共同推动组成“农村女青年社”,主要目的是使已识字的女青年继续接受公民教育,特别是改良农村家庭生活的原理与方法。

璧山县的经济建设,自“育才院”研究部毕业生范葆清经“平教总会”推荐出任县政府经济部股主任,即与“育才院”农业系合作,进行县单位农业推广工作。全国农业推广委员会捐助部分费用,以便顺利进行。



璧山杨家祠农业生产指导所(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支持其工作)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特别的研究部与社会行政系

1942年6月,“育才院”第一届学生,完成两年学业及实习。毕业生都如预计:一部分担任农林部垦殖工作,若干人往县单位参加乡村改造。或在乡村师范、中学任教。成绩最优的几人即留院任助教。9月秋季始第二届新生入学,农业及农村教育两系仍各为五十人,又另招五十名新生入新设立的水利工程系及社会行政系。前者是为了应四川各地水利工程的急迫需要,后者是为了认识战时及战后的社会变化而设立的。

“育才院”创立之初,特设研究部,旨在培养全国需要的高级人才以致力于乡村改造。甲种研究生必须是回国留学生又具有工作经验或在国内有成就的,才是合格人选。录取后并不参加训练,由晏阳初院长亲自指导,就其专长择定一有关乡村工作项目加以研究,出席有关会议及讨论会。期望使其了解乡

村改造的精神,充实为农民服务的决心信心。院方每年给予奖学金及旅行考察费。乙种研究生必须大学毕业并有二三年工作经验。训练期为一年或二年,视其研习科目而定,是为县政府行政或技术人员、乡村师范学校行政、管理合作社作准备,和甲种研究生为中央或省政府乡村工作的行政及技术人员、乡建中心主任、“育才院”或其他高级学府讲师的性质程度不同。

“育才院”设有研究生委员会,由院方邀请省政府各厅长及有关的区行政督察专员担任,提供研究生实习的便利。例如一九四二年秋季的甲种研究生崔仲白是美国艾阿华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回国后任全国水利委员会专家,

^⑨ 瞿世英(1901-1976),笔名菊农,江苏武进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早年与郑振铎、瞿秋白、赵世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人道》月刊。五四运动中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192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多所大学教授,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研究部主任、代总干事长,重庆乡村建设育才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团顾问兼秘书长。著有《教育哲学》、《教育学原理》、《乡村教育文录》、《现代哲学》、《西洋教育思想史》,与人合著《中国古代教育史》,并译有《西洋哲学史》等。

来“育才院”进行“农业地区小型水利工作的推广”。李湘源博士是国内著名的鱼类学专家、农林部实验鱼孵化所所长,对四川、广西鱼类甚有研究,来“育才院”研究“四川、广西两省鱼类养育之比较研究”。唐道一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对农业经济特具兴趣,参加全国合作行政协会工作多年,来“育才院”研究“战时农村合作社趋向”。盛成桂是金陵大学园艺系毕业,来“育才院”研究“四川东部若干水果生长的改良方法”。胡学衡(女)是燕京大学毕业,来“育才院”专门研究“农村妇女读书初阶”。由这些不同学历和经历的人前来“育才院”研究,高级知识分子对乡村工作的兴趣可以概见。

同时,四川省政府、中央社会部、四川银行界、企业界眼见“育才院”的进展,也捐助款项加以支持。罗氏基金会也给予补助,其中每年资助的购书费,按时由“平教总会”在美购书顾问委员会选购新书刊寄来,使在被日军封锁的中国,仍有获得新知的机会。

“育才院”是“平教总会”当时的中心工作,“总会”本身有关部门仍继续根据全国情形作实验研究,如“战时社会动向”、“农村教育调查”、“中心学校实验”、“农村女青年社实验”、“乡村中学实验”、“乡村师范及短期教师训练班之研究”、“乡村卫生保健调

查”、“新县制及地方自治研究”、“行政督察专员区之研究”、“农村妇女动员研究”等都有具体成效。

日本侵略战火破坏了中国许多机构,但中国人却仍在继续不断地努力建设。许多美国人不了解这种情形,经常提出:战争中怎么有建设的可能?晏阳初寄信给他们详细说明:一、日军占领的只是“点”“线”,广大的“面”仍在中国控制下。二、战争增加中国人许多经验和效率以进行抵抗和生产。三、西南、西北广大地区人力物力丰富。四、中国在战时有很多革新。“平教总会”在战时工作比较平日更加扩大、更受国人重视。这显示中国农村的特色,尤其农民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晏阳初因积劳成疾,只得转往成都就医。在1943年春天,他又因公飞往美国,至此,瞿世英代理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院务。

此文选自吴相湘所著《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五十年》一书,内容有删改。此文图片由重庆市北碚区文广新局提供。

(责任编辑 朱林)

(上接第32页)

究。在他的带动下,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当时财力、物力各方面的条件很差,政治环境也比较恶劣,全院教职工抛开个人的冤屈得失,想方设法地创造条件,夜以继日地进行科学研究,在学院的大力支持和教职工的努力工作下,学院的科研工作很快得到了发展。1972年,学院编印了《西农科技》,主要报导学院科研情况、实验小结和研究报告等,与全国有关兄弟院校、科研单位及行政业务管理部门交换。1973年学院又编印了《科技情报》,主要翻译国外有关农业科技资料,与有关单位内部交换。内部资料的编印促进了学院与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科技情报交流。^⑩1972年的科研项目全是学院自拟课题,1973年四川省高教局下达了3项,以后全国、省、市

项目逐年增加,到1976年国家下达的有3项,四川省下达的有13项。从科研方向来说,1972年的项目多数是结合农业生产急待解决的应用方面的研究,以后逐步转到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同时小课题逐步转入大课题,并且比较重视与生产单位和科研单位的协作。科研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发展。从1972年到1976年学院的科研项目共有178项。截止1976年底,土壤肥力理论研究、激素养蚕增产蚕丝的研究等20余个课题获得成果,并开始在生产上发挥效益;另外还有10余个课题初步取得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 李亚勃)

^⑩ 《我院出版刊物汇报》,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73-党群-50。

校史中的邵鹤亭

□文/朱文婉



邵鹤亭

邵鹤亭(1902—1966),江苏宜兴闸口乡人。早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系,获学士学位。1928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致力于教育科学与哲学的研究,毕业时获社会文科博士学位。1932年法国留学

归来,担任省立常州中学校长,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并发动募捐,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同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尤莱氏思想与革命理论之研究》出版。1934年夏,他辞去常州中学校长一职,担任四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和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创建)院长。他还历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教授、国民政府教育部专员、国立编纂馆编撰兼教育组主任,解放后担任教育部参事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职。邵鹤亭一生精通英语、法语、俄语,对中外教育史颇有研究,与我国著名的教育史学家毛礼锐^①一同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教育史》,并著有《训导原理》和《社会思想与教育》等著作。

邵鹤亭于20世纪30年代担任四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与甘绩镛和张宗麟^②等共同厘定“研究乡村建设学术,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实验乡村建设工作及推进乡村建设事业”的建校宗旨,并继甘绩镛之后任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第二任院长。我们遍寻重庆市档案馆和西南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希望能找到邵鹤亭任四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时的相关档案史料。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他的部分专著和学术论文以外,我们别无所获,更无法整理出他与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的相关文字材料。由此我们向全校师生征集邵鹤亭的文字与图片资料,期待与大家一起走近他、走进他的教育思想,走进他与四川乡村建设学院。



西南大学档案馆收集到的有关邵鹤亭的学术资料

(责任编辑 李亚勃)

^① 毛礼锐(1905—1992),江西吉安人,中国教育史研究专家。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1937年回国后历任河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其中曾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系主任及院长。主要著述有《新民主主义与教育》(《教育通讯》复刊号第九期)、《教育与经济》(1948年《政治季刊》)、《古代中世纪世界教育史》(与张鸣岐合编,195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教育史》(与邵鹤亭、瞿菊农合编,1979年出版)。

^② 张宗麟(1899—1976),浙江绍兴人,幼儿教育学家。在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筹建期间,受陶行知的推荐到校主持教务,任乡村建设学院教导部主任。主要著作有《幼儿教育概论》、《给小朋友的信》、《乡村教育经验谈》、《幼儿教育论文集》(与陶行知、陈鹤琴合著)、《乡村小学教材研究》和《幼稚园的演变史》等。

编者按:没有中国乡村的发展就没有中国城市的发展,也就没有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西南大学百年办学的历程中,我们不得不提到国际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和他于抗战时期(1940年)创办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坐落在距北碚10多公里的歌马场附近(现西南大学研究院院内),只有几排白色的平房,与周围碧绿的田野和农舍融为一体。它独特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模式,对西南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8年,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社会系同学在璧山县大路乡社会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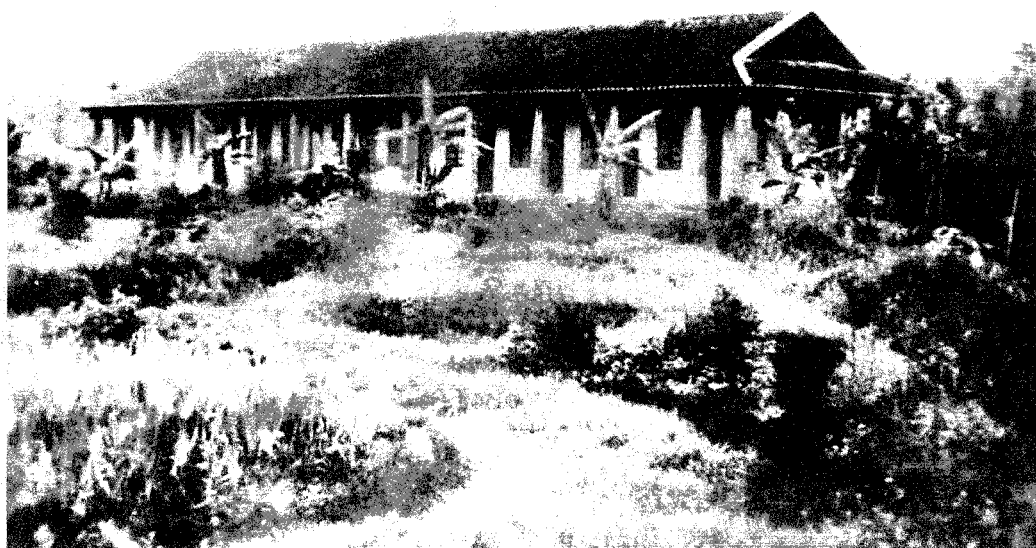
1950年春,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农业推广繁殖站为农民贷放优良稻种



1950年春,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教育系学生在教室前合影



晏阳初(前排右七)与部分教职工合影



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教室

(图片由重庆市北碚区文广新局提供)

(责任编辑 朱 林)

西南大学寻根(之八)

——西南农学院的发展(上)

□文/张晓华

编者按:1957年到1965年,西南农学院根据上级的要求和部署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学院的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学院的发展出现了曲折。通过排除干扰,调整提高后,学院出现了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质量提高的局面。但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学院遭受了严重的灾难,在教学科研上蒙受了重大损失,教学科研被迫停下来,招生中断了十年。全院教职工忍辱负重,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使学院得以艰难地前进,为四川省的农业高等教育和农业生产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运动不断,学院发展遇挫折

1957年到1965年,西南农学院根据上级的指示和部署频繁地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学院的教学科研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学院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时期。

(一)政治运动对学院工作的冲击

1957年,学院在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为了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学院又在上级的部署下开展了反右斗争。和全国一样,学院

的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据统计,仅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就有173人被错划为右派,其中,学生120人,教职员53人(正、副教授14人,讲师及助教12人,职员27人)。在被错划的人中,有3人被逮捕判刑,有19人被送去劳动教养,有8人被开除党籍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有73人被开除团籍。^①在反右斗争中,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团干部被错划为右派,被迫从教学、科研、管理工作或领导岗位撤换下来,严重影响了学院的教学工作、科研工作、民主风气和学术气氛。反右斗争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学院又开展了“双反”(反浪费、反保守)、“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运动中,陈兆畦^②等一批著名老教师错误地受到了重

^① 《西南农学院关于对右派自查改正工作的总结》,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80-党群-3。

^② 陈兆畦(1895~1986),男,汉族。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曾任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主任、中国原子能农学会名誉理事、四川省土壤学会名誉理事等。他长期从事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对生物化学、农业生化及同位素在农业上的应用都有较深造诣。撰写发表论文20余篇,专著有《放射化学》、《植物生物化学》(合著)等。《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名录》第237页。

点批判,并被以各种方式撤换了职务,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对他们本人造成严重的不幸。这些运动违反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客观规律,挫伤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影响了学院的正常工作。

1959年,学院错误地开展了党内“反右倾”斗争。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口号下,学院出现了更多的失误,工作困难重重。在“反右倾”斗争中,对一部分敢于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员干部进行了许多不实的揭发和乱上纲上线的批判,挫伤了一些党员的积极性,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影响了党内的团结,不但中断了对1958年以来教育大革命中许多错误做法的纠正,而且继续加以推行,使错误一再延长,给学院的事业和各项工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1962年1月,在中央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学院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风运动、“三反”(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运动及“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虽然这些运动都是在行政部门进行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运动也只是



纯洁革命队伍,肃清反革命,师生参加斗争大会^④

在党员干部中进行,在教师和学生中只是在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并没有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但由于对学院的形势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把一大批教师和干部视为敌对势力和异己力量,强调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使学院在调整后出现的稳定发展的势头受到严重干扰。

(二)过多生产劳动对学院教学秩序的干扰

1958年春,学院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的群众性运动。学院先后两次批准和组织118名教职工和205名学生下放农村参加体力劳动,连同1957年下放的新参加工作的35名助教,一共下放了358人。^⑤未下放的学生和教职工也要兴修水利支援农村。学生每周上课的时间被压缩为24-25学时,以1-2天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严重影响了学院正常的教学工作。

1958年,学院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教育大跃进的形势下,提出了“大办农场”、“大办工厂”、“大办科研”的口号。在大办农场方面,全院师生员工组成九个生产队,参加种试验田、实习田,另外还抽出人力协助校外办了21个农场。^⑥在此期间,农业生产战线上出现



全院师生声讨右派^③

^③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P4-1。

^④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P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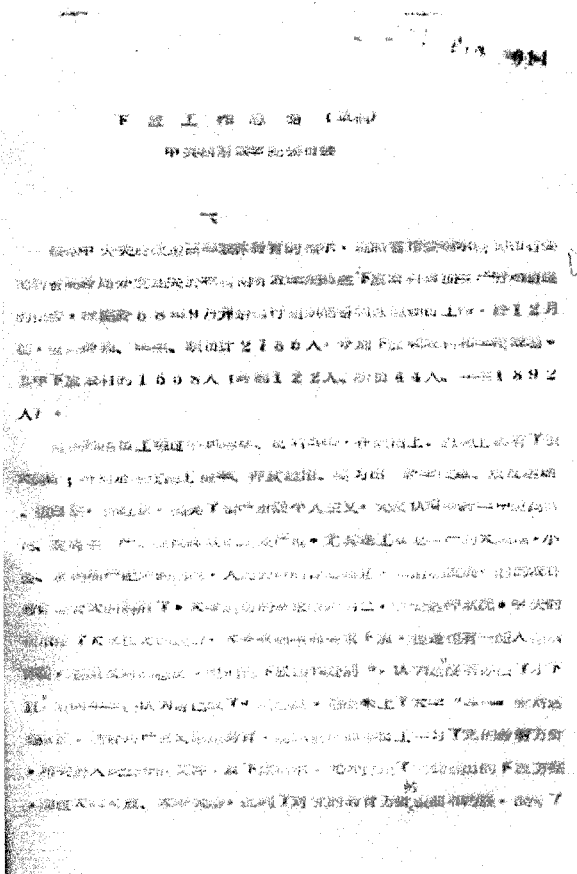
^⑤ 《西南农学院整风运动总结报告》,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8-党群-3。

^⑥ 《整风大检查总结报告》,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8-党群-3。

校史校情

了“打擂比武”，学院提出了许多不切合实际的产量指标和以浮夸风为主要特征的口号，如：晚稻亩产25000斤、红薯亩产20万斤、蔬菜亩产2000万斤等，这些指标无一实现，不过经过全院师生员工为实现高产所作的努力，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小麦平均亩产由1957年的270斤增加到1959年的501斤，中稻平均亩产由1957年的510斤增加到1959年的608.6斤，^⑧创造了学院的最高记录，获得了空前大丰收。在大办工厂中，全院一下就出现了110个工厂，后经初步归口合并，属于全院性的大厂有12个，另外还协助校外办了86

个厂。在大办学校中，学院与北碚区委合作创办了北碚农学院，主要培训市郊区和县的乡、社农业干部。同时，学院还协助专区、农场、人民公社办了10个大、中学校。在全民炼钢运动中，全院固定参加炼钢的就有575人，共建了44个大小鸡窝炉和1个小转炉。^⑨在大闹技术革命方面，全院共有技术革新项目155项，其中已达国际水平的3项，属于国内首创的11项，达到全市水平的25项。^⑩1958年8月，学院在科研上提出了“人人鼓干劲，发挥协作精神，大搞高尖精缺，赶上国际水平”的口号，全院掀起了创造发明的高潮，提出革新项目142项，上报技术革新成品31项。师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虽然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同时也取得了一些



中共西南农学院委员会下放工作总结^⑦

研究成果，但在浮夸风影响下，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办了许多蠢事，而且过多的生产劳动和过量的科研课题占用了师生大量的时间，偏离了以教学为主的办学原则，打乱了学院的正常工作。

1958年，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开展勤俭办学、勤工俭学、勤劳生产的号召，学院开展了以勤工俭学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学院提出“试验田又是教室，又是实验室，又是科学研究所，又是丰产田，又是马列主义教育阵地”的口号，采取边耕边读、教师干部种试验田，学生种实习田的措施，开展了以农业生产劳动为主的勤工俭学活动。学院于1958年9月开始进行组织准备和思想动员工作，12月初，全院教师、学生、职员共2735人，分别下放到农村和学校农场，其中下放农村的有1558人（教师122人、职员44人、学生1392人）。^⑪由于当时强调劳动锻炼，师生的主要活动是参加劳动，因此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进行教学，后来才开展了一些教学活动，并从教学计划、教学方式、教材编写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变革。由于是以生产为中心，强调教学服从生产，强调现场教学，实行教师、学生、农民（工人）三结合，“能者为师”，教师、学生、农民（工人）都可以讲课，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被削弱。同时，在教育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学院减少了课程门数，本

^⑦ 《下放工作总结(草稿)》，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9-党群-88。

^⑧ 《1957—1959年发展情况》，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9-党群-60。

^⑨ 《开展全民炼钢运动》，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校史资料卡-40。

^⑩ 《整风大检查总结报告》，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8-党群-3。

^⑪ 《下放工作总结(草稿)》，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9-党群-88。

园艺系果树栽培课现场教学^⑫

科由过去的30-33门减少到19-31门,教学周学时数由过去每周22-33学时减少到17-24学时,假期由过去每年6周减少到2-4周,实习时间也由过去7周缩到1-2周。^⑬课堂理论教学时间的大大缩减,削弱了基础理论课和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影响了课堂系统知识的学习,从而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为了人民生活有所改善,1960年重庆市提出了若干“大抓”、“大办”、“大搞”,围绕生活问题开展了许多突击运动。学院也提出了“继续大跃进,更上一层楼,干劲要鼓足,右倾要反透,看涨不看落,人人争上游”的口号,大搞群众运动,大上新专业,大搞科学研究,大闹技术革命,大力支援农业,大办粮食,大种蔬菜,大养生猪,大搞代食品,经常组织师生参加基建劳动,进一步使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压倒了教学。如在1959年8月开始的全院蔬菜生产自给的群众运动中,明确分工,按照依人定量,包工包产的办法,按每人每天自给1斤的指标将任务分配到系,在不到一个月内,蔬菜种植面积即从28亩扩大到135亩。^⑭1958年“左”的错误不但未能克服,反而被全盘肯定,并继续加以推行,学院再次出现了教育大跃进的局面,教学秩序更加混乱。

二、在调整提高中曲折前进

1958年,中共中央企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急于求成,发动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运动,加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失调,陷入困境。同时,频繁的政治运动也使学院的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教学质量严重降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纠正“左”的错误,克服国民经济困难。高等教育部也采取相应部署,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集中力量提高教学质量。学院也进行了教学改革,修订了各专业教学计划,加强了政治课的教学工作。接着又修订了教学大纲,通过统一教科书和自编讲义,使各门课程都有了教材。教师任务和课程表也相应地加以固定,使教学秩序基本稳定起来。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除加强教材建设工作外,还注意提高师资水平。同时还加强了教学研究,逐步丰富教学内容和积累教学经验。另外还在北碚、綦江、巴县等地建立了基点^⑮,加强了理论与生产实际的联系。^⑯通过这些改革,教学工作逐步深入,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学院出现了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质量提高的新局面。

(一)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1960年,学院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教学质量,如: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充分发挥教研组的集体作用,集体备课,集体讨论教材和教学方法;坚持青年教师试讲;以实物结合理论进行讲授;结合课堂讲授进行现场教学等。^⑰这些措施使学院教学质量有所提高。

1961年,学院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

^⑫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P32-1。

^⑬ 《向农业部高等农业教育局的紧急汇报》,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02-1958-党群-20。

^⑭ 《蔬菜生产自给的初步经验总结》,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0-党群-73。

^⑮ 基点指作为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的基础的地方。

^⑯ 《第二届党委工作报告》,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4-党委-36。

^⑰ 《院党委支援农业工作报告》,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0-党委-60。

关于贯彻“少而精”原则提高教学质量的几点初步体会

西南农学院

我国自1958年以来,在教育战线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事实上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生产劳动的开展,促进了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教育,而在政治思想方面起了重大变化,改变了教学工作,同时积累了教学经验。1961年学习“高教六十条”,贯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原则,修订了教学计划,稳定了教学秩序,解决了教材的有关问题,拟定了教学上有关的规章制度,教学秩序有所提高。在教学上存在过高的教学要求,片面强调提高,不顾学生实际,把自己的课作作了不恰当的评价,且多自满,不求革新,改进。教学中,曾发生学生学累,教师教累,甚至学生厌学,教师厌教,产生学生厌学情绪,学习困难现象,而学生对许多基本知识未能学到手。这在第一步深入教学改革的初期,对教师、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全面发展人才的时候,出现了新的矛盾。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1961年西南农学院各系校系教学改革,结合学校具体情况,作了一系列措施,在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主要作了以下工作。

一、把教学工作的重心移到教学中去。

在贯彻“少而精”原则,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教学工作的重心,必须移到教学中去,才能贯彻“少而精”原则,提高教学质量。

提高教学质量的体会^①

高”的方针,开始压缩专业数量,控制办学规模。经过调整,学院专业从18个调整到7个,1958年后新办的专业只保留了农业生产机械化专业,其余的全部停办。同时,学院将每年招生人数控制在600人左右,并对各种代培班也进行了调整。另外,学院还通过精减职工队伍,整顿实习农场,对受过批判的人员进行甄别等措施纠正1958年教育大革命以来的一些错误。同年9月,中央批示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校六十条”)。学院通过党内整风,在统一干部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试行“高校六十条”。学院采取措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努力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保证教师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并注意劳动保

护,妥善安排教师的工作和劳动,纠正一切不尊重教师的现象。通过这些措施,教学秩序开始稳定,教学质量逐步提高。

1961年以后的几年中,学院从教学计划、教材、教学大纲、教师和课程表五个方面着手抓教学工作,做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师、课程表五固定,保持教学秩序的相对稳定,为提高教学质量创造条件。在教学时间安排上,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四年制本科的总学时控制在2800—2900,全年教学8.5个月,生产劳动1.5个月,假期2个月,既保证了教学时间,又使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提高课堂讲授的质量,强调学术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上第一线,抓好备课和课后分析讨论,课堂讲授抓住重点,分清主次。同时还加强了实践性教学环节,加强学生基本功的训练。另外还制订学生成绩考核制度,

关于试行半农半读农学专业的几点意见

西南农学院

根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又红又专、能文能武、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全面发展的坚强的革命后代。除了彻底改革现行学制、大力提高质量外,有计划地积极发展半农半读专业,具有非常深远的重大政治意义。1958年教育革命过程中,曾经试行半工半读、教师种试验田,学生种实习田,继而把学院师生下放农村,一边生产劳动,一边进行学习,有些课程,结合生产进行教学,就像他们在生产劳动中受到坚强不同的锻炼,又使他们联系了生产实际,业务水平有所提高,某些教学环节(如现场教学)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有些经验没有很好总结,而在我们办学思想上又受着旧教育制度的影响,有美国的、有苏联的、也有某些错误的,因此半工半读制度和下放农村的某些好的经验,没有很好地继续加以巩固和发扬。

学习了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又学习了刘少奇同志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使我们脑子开动起来,我们又看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半工半读的经验,这个学校在1958年创办以来,六年中既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中、初、高级技术人才,又在开发山区方面作出成绩,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我们认为它的方向正确,成绩显著,办得很好,我们应当向它学习。最近

关于试行半农半读农学专业的几点意见^②

^① 《关于贯彻“少而精”原则提高教学质量的几点初步体会》,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4-党群-44。

^② 《关于试行半农半读农学专业的几点意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4-党群-44。

严格控制考试门数,加强学生自习,使学生学习负担比较均衡。通过这些措施,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①

1964年,农业部和高等教育部作出决定,将西南农学院等六所高校作为试行半农半读的学校,分别为所在大区培养半农半读的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专业课教师。于是学院从1964年10月开始了半农半读教育制度的探索。从1965年春开始,学院先在除农业生产机械化专业外的农学、果树蔬菜等六个专业的一年级试行半农半读教育制度。农业生产机械化专业从1965年秋开始实行半工半读,这样到1967—1968学年,全院完全实行了半农(工)半读教育制度。由于学院实习农场面积小,学院先在江北农场试办半农半读教育制度8个月后,撤出江北农场到合川县铜溪镇的“合川县示范繁殖农场”及“四川省农业科学江津园艺试验站合川实验场”继续办半农半读,直到1966年6月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半农半读以生产劳动为主,结合生产进行教学,农忙抓生产,农闲抓教学。半农半读虽然降低了培养人才的要求和学校的教学质量,但在大量培养中、初级农业技术人才,普及农民的科学文化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 实行多层次办学

1.继续招收研究生。1960年学院决定继续招收研究生11名,经考试及审评,最后录取了土壤专业及植物生理生化专业研究生各1名,于1961年春季入学。1964年,学院本着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招收了土壤专业研究生1名,1965年在学院已开始试行半农半读准备停止招收研究生的情况下,仍招收了1名土壤专业研究生。

2.开办函授教育。从1960年秋季开始,学院又开始举办函授专修科,设有农学、植保、蔬菜、农机四个专业,招收重庆、江津、内江等7个专区的农校、农场的技术干部。1960年招生165人,毕业7人;1961



创办红专学校,为公社培养人才^②

年招收第二届函授专科生42人,毕业15人;1964年春招收123人;1965年招收317人,学员来自四川省十四个地、市。

3.举办农民干部进修班。为了贯彻高等学校为工农开门,增加工农学生成份的比重,学院于1958年下半年开办了一期预备班性质的农民干部进修班,招收具有高中文化的农业干部和农民,修读一年后如能达到高等学校新生入学水平即免试升入本科一年级。学院在江津和万县专区共招了36名新生。一年后有18人升入本科,3人抽出参加工作,15人中断学习返回原单位,农民干部进修班也随即宣告结束。

4.大力为公社培训技术人才。培训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在校内举办短期训练班。从1958年到1960年两年多时间在校内共举办训练班22次,培训了技术人才1280多名;第二种是举办为时较长的专修科,如土肥专修科、农机专修科、蚕桑专修科等,1958年至1959年还与市委农业部共同举办了重庆农业干部学校,培训了500多名公社农技干部和社干;第三种是下放到农村举办各种训练班,从1958年到1960年两年多时间里在公社举办的训练班约200余次,培养了技术干部36000多人。^③

5.培训“劳模”和“土专家”。在1965年,学院应

^① 《关于61年部颁教学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4-党群-44。

^②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P25-1。

^③ 《院党委支援农业工作报告》,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0-党委-60。



园艺系学生正在进行红苕烘干贮藏²³

四川省农业厅和四川省高教局的要求举办了省内劳动模范和“土专家”培训班,接受了绵阳、南充等五地、市选送的8名具有比较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农村基层干部和技术骨干入学。学院计划经过两年的培训,使这些学员达到相当于大学专科水平。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员陆续返回原选送地区,培训计划并没有完成。

此外,学院还从师资等方面大力帮助省内外新建的农业学校,扩大培养干部的基地。如协助市农业局和巴县筹办了巴县农业专科学校,协助长寿、綦江新办农专,对简阳、绵阳、万县等农专也多方予以帮助,另外学院还承担了许多院校教师前来进修的任务。

(三)积极开展科研工作

1、改善科研条件,促进科研工作。

1958年夏,学院开展了群众性的工具改良和技术革新运动,鼓励师生撰写有关经验总结和创造发明的文章,并制订了创造发明和高额丰产的奖励办法。1958年秋,科研科着手改进科研资料工作,开始编印内部刊物《科学研究交流资料》和《农业科技情报》。同年8月,全院掀起了创造发明向党献礼的高潮。1958年,学院上报了16项科研成果。

1959年春,学院成立了科学情报资料室,编印出版了《农业科学参考资料》、《农业科学情报》、《国

外农业期刊论文索引》、《国外农业期刊论文文摘》、《农业丰产经验专题目录》等资料,同时开辟阅览室供师生查阅资料,择要介绍新到的资料,提供专题目录,为学院的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开展。1959年4月,学院将1958年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以简报形式印发有关单位进行交流,加强了与有关单位在科学研究上的联系与交流。1959年全院开展的科研项目有219项,参加科研的教师99人,学生624人,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如:植物保护系与四川省农业厅、省农科所合作进行四川省病虫区系调查,写出《四川省主要农作物害虫名录》,在贮粮害虫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了成效;土壤农化系师生参加土地普查和长江流域规划,完成了国家资源调查和土地利用的任务;园艺系在果树上山、淡季蔬菜生产等方面也取得了进展。²⁴

1960年,学院贯彻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精神,大抓献礼项目。加强对科研的领导;加强技术队



课内和课外相结合,师生进行野外考察²⁵

伍建设,组成50人以上的基础理论和尖端科学的技术队伍,并调部分教师作为专职科学研究人员;紧抓基础理论和尖端科学的研究,猛攻农业生产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大力开展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搞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的“四化”和加上联运化为“五化”的

²³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P17-4。

²⁴ 《贯彻教育方针后的成绩》,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8-党群-17。

²⁵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P42-1。

群众运动;大搞协作,校内外结合,进行多点对比试验。在大搞科学研究、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过程中,全院有1342人参加科研工作,有2246人直接参加了“四化”和“五化”运动。虽然广大师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取得一些成绩,但在当时反右倾和继续大跃进的形势下,无论在完成的数量上还是在质量的评价上,都被严重的夸大了。

1962年10月,学院根据农业部全国农业十年(1962年——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制订出全院科学研究十年(1963年——1972年)规划。到1963年底,完成了7项科研成果。1965年,早、中熟玉米杂交种的选育、双季稻品种引种试验等取得了成果。

2. 建立科研基点,推广科研成果。

从1960年开始,学院陆续在北碚、綦江、巴县、江津、万县、简阳、宜宾、泸县等地建立了科研基点。学院派工作组到基点大队蹲点,种好试验田,树立示范样板。同时,学院还将一些科研成果在各地科研基点上进行推广。如:为重庆、江津等地区的粮食、菜种、家畜家禽进行同位素照射;为广安、綦江、北碚、长寿、简阳、合川等地供应玉米合玉杂交种、水稻“铁芦早”等优良品种;1964年,学院还根据农业部的通知组织教学科研人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赶制出1377件昆虫、植物病理、植物、动物等标本支援越南。

三、艰难的文革岁月

“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全国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和内乱,高等院校也遭受了严重的灾难,而农业院校遭受的灾难尤其深。和其它农业院校一样,西南农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经历了一场浩劫,

遭受了史无前例的伤害和损失。

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党的领导被取消,党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民主党派受到冲击,党同群众的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很多教职工受到迫害,遭到残酷批斗,受到残酷虐待和百般折磨,残酷的批斗甚至使何文俊^⑤和管相桓^⑥等著名教授含冤致死。据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学院被审查教职工共214人,占原有教职工总数的22%,其中,干部52人,教师144人(正、副教授31人,讲师54人,助教、实验员59人),工人18人。在被审查的教职工中,有5人因受审查迫害致死或在审查中病逝。^⑦广大教职工身心上受到很大伤害,很多教师和干部眼睁睁地看着家里的私人贵重财物、著作被抄走,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制作的教学科研资料、标本、实验器具被造反派随意践踏,毁于一旦。比这更惨重、更令人痛心的是整个学院的难以估量的损失。学院仪器、设备、物资遭受严重的损失。据统计,仪器、设备损失和损坏3557台(件)、图书馆藏书损失了33600余册(占总数的8%),家具损失和遗失了7822件(占总数的30%)。当时在校的一、二、三年级学生因“停课闹革命”而未学完应学的课程,考试制度被废除,实行群众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办法和“朝阳农学院经验”^⑧,不仅招生质量无保证,而且在教学安排上推行“以生产为中心,季节为顺序,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必须服从生产的规律性,干啥学啥,以干代学”,形成教学无计划、上课无课表、讲课无教材的混乱状态。学院招生一度中断十年。科研工作也被迫停止,科研材料和资料被毁掉,教师的科技业务荒废了好几年。这些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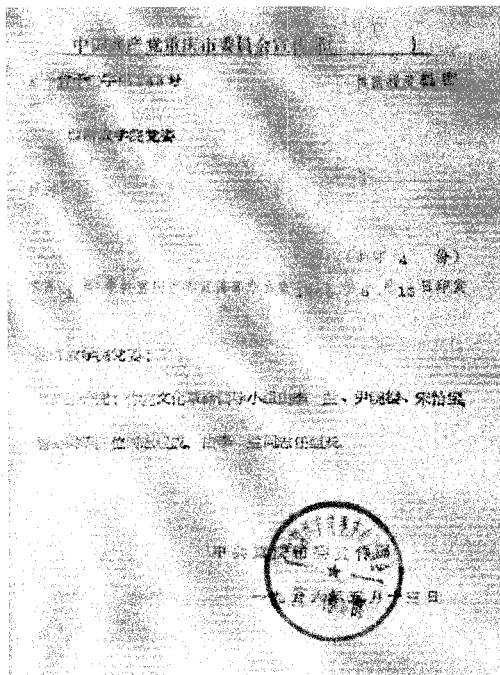
虽然“文化大革命”给学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⑤ 何文俊(1909~1967),男,汉族。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爱沃华农工学院留学并任教。1951年任西南农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西南农学院副院长、全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等职。他从事农业教育和科研工作30余年,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专家,先后在美国和我国农业有关的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专著有《植物病理学基础》一书。《西南农业教授名录》第1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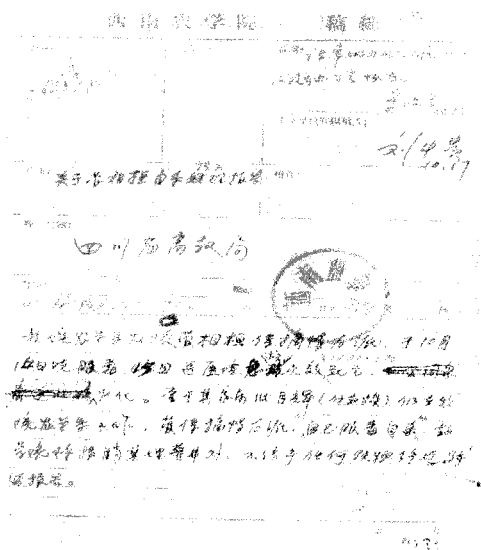
^⑥ 管相桓(1907~1966),男,汉族。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在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授。1950年调至西南农学院农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遗传学教研组主任,西南农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兼副教务长。育成水稻良种二十个,作水稻连系遗传研究曾创立第六连系群而受嘉奖,代表论著有20余篇。《西南农业教授名录》第359页。

^⑦ 《关于落实政策的简要情况》,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79-党群-6。

^⑧ 朝阳农学院经验主要指朝阳农学院坚持在农村办学、分散办学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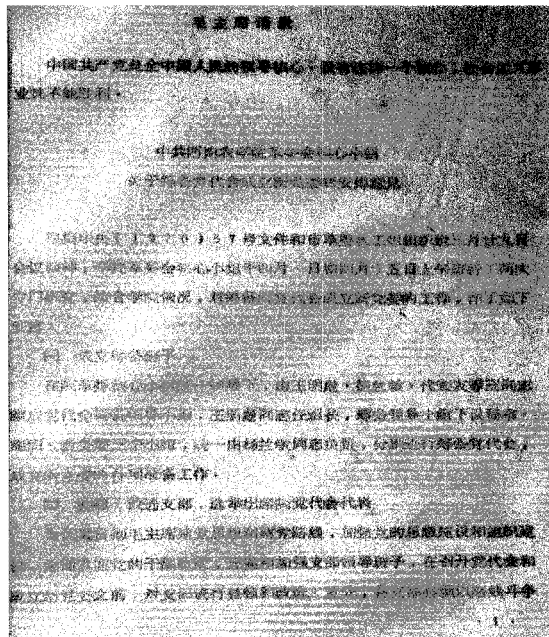


关于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通知³⁰



关于管相桓自杀情况的报告³¹

然而在逆流中,学院全体教职工忍辱负重,抵制撤散西南农学院、抵制“批林批孔”³²、消极对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³³,并在1973年成立西南农学院临时委员会后逐步开展教学、科研和其它各项工作,经过全院教职工的共同努力,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三、四年内学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关于筹备党代会成立新党委的安排意见³⁴

(一)坚持教学工作

1.举办茶叶干部训练班。1973年,四川省农业局委托学院举办为期10个月的茶叶干部训练班。这期训练班共有66人,于1974年7月毕业。

2.招收工农兵学员。1974年4月,学院按四川省高教局通知,农学、果树等九个专业招收工农兵学员536名,学制二至三年,于11月6日开始上课。

3.办“社来社去”试点班。1974年,学院开始学习“四人帮”炮制的“朝阳农学院经验”。1975年4

³⁰ 《西南农学院关于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通知》,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6-党群-3,第15页。

³¹ 《关于管相桓自杀情况报告》,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6-行政-14。

³² 1973年7月,毛泽东在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历时半年左右。在此期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露骨地攻击周恩来,借机进行夺权活动,后被毛泽东发现,其阴谋未能得逞。

³³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在“四人帮”煽动下由毛泽东发起的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

³⁴ 《中共西南农学院革委会核心小组关于筹备党代会成立新党委的安排意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72-党群-47,第48页。

月,根据农业生产布局,学院在南充、万县地区,与地区农校合作,举办“社来社去”^⑤试点班。南充地区招生 200 人,分设农学、果树蔬菜、畜牧兽医三个专业,学院派去教职工 33 人。万县地区招生 300 人,分设农学、果树蔬菜、蚕桑、畜牧兽医四个专业,学院派去教职工 28 人。“社来社去”试点班学制一年,学员毕业后,教职工即撤回学院。1976 年,学院在重庆市和宜宾地区招收“社来社去”班。重庆市的班由学院负责;宜宾地区则由该区自行筹办,学院仅派少数教师前往上课。

4.举办农业短训班。学院从 1969 年起就开始举办农业短期培训班。为了搞好“教育革命”,从 1972 年,起学院将大部分教职员下放到南充、达县、宜宾、江津四个地区,举办各种类型的农业短训班。短训班的举办方式主要有单科培训、以点代训、定点办班三种。单科培训是主要方式,主要是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在生产第一线举办各种形式的单科性的短训班;以点代训主要是长期蹲点,就地培训,这种培训方式范围窄,人数也不多;定点办班是指农业主管部门或地区委托举办全省性或全区性的训练班,以提高在职农业技术和农业管理干部的科技水平。^⑥短训班的培训时间因需要而定,每期从数日到数月不等。从 1969 年到 1975 年学院共举办 229 期培训班,培训学员 37127 人。^⑦此外,还有很多单位邀请教师办班和作咨询服务。

5.办业余农业大学。学院在金刚、歌乐山和井口办了三所业余农业大学,共有 18 名教师参加。

6.进行农业咨询服务。学院从 1969 年起就开始零星地开展农业咨询服务,以后重点转移到建立县、区、社、队四级农业科技网工作上来。学院派出许多教师和技术工作人员参加这项工作,并在农业咨询服务中开班培训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技术推广工

作,同时印发各种科技资料,以提高农民和农业科技人员业务素质。

(二)继续开展科学研究

“文化大革命”中,科研材料和资料被毁,科学研究无法开展而中断了几年。1971 年学院开始在微生物方面进行试验研究,直到 1972 年全院才开始恢复科学研究工作。趁着学院开始恢复教学科研工作的时机,侯光炯鼓动关系比较好的教师齐心协力重新把土壤研究搞起来。他的许多学生深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决定继续跟随他为建立中国的农业土壤学贡献力量。1973 年 3 月,侯光炯在简阳县镇金区建立了科学试验基地,开展水、肥、土、林的综合研



1974 年侯光炯^⑧在简阳镇研究坡瘠地改土和红苕栽培试验^⑨

(下转第 19 页)

^⑤ 所谓“社来社去”,是指从哪个公社上大学的,毕业后就分回到哪个公社。

^⑥ 《办短训班,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73-党群-57。

^⑦ 《开门办学基本情况统计》,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75-党群-59。

^⑧ 侯光炯(1905~1996),男,汉族,一级教授,土壤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曾任四川大学、铭贤学院(山西农学院前身)、重庆大学、川北大学。1952 年调至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任教授,曾任土壤农化系主任,科学研究部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质学部常务委员等职。他从事封科学研究 60 多年,完成了“水稻土土层分类及命名概则”、“中国土壤分类”、“水稻自然免耕”等研究工作。《西南农业教授名录》第 1 页。

^⑨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侯老专题(一)。

编者按:侯光炯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他一生专注于土壤研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中国科学院专门为他在西南农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自土壤研究室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不仅影响了侯光炯的家庭,同时也影响了侯光炯的事业以及土壤研究室的发展。

那段岁月中的侯光炯与土壤研究室

□口述/李兰^① 整理编辑/郭兰

文化大革命对侯光炯家庭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前为了研究土壤,侯光炯经常待在农村,家还在学校,但是侯光炯对夫人很关心,夫人在世的时候还是过段时间要回西南农学院,夫人去世后,就不怎么回学校了。他夫人身体不好,一直没有在外工作,因为家里有四、五个小孩,所以主要在



侯光炯(左一)与农民同吃同劳动^②

家料理家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要造侯光炯的反。整个学校停课,他也受到冲击,他过去在西南农学院里是“权威”、一级教授,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头衔很多,头一号的“反动学术权威”^③,受冲击也不可避免。学生一定要找他的问题,不像我们当干部的,执行这个那个路线,不听毛主席的指示等等。学生也找不出他这方面的问题,就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把他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④,当时我也“靠边站”^⑤。那时批斗会容易开,学生“造反派”一说,大家把他围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并且让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参加劳动,当时叫“劳改”,就是要劳动改造。那时学校校门旁(现斑竹村对面)是水田,学生有时也会在这里实习。我从旁边路过时看到侯光炯在水田里,学生让他弯腰插秧,他是高度近视眼,泥巴都糊在眼镜上了,学生还吼他。那时他年纪已经不小了,我42岁,

^① 李兰,女,1938年7月在山西参加抗日工作,此后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晋绥分区党校、中共晋绥八地委、中共吕梁区委、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等处工作,1954年底调入西南师范学院任办公室主任一职,1956年调入西南农学院,历任学校党委副书记、书记。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LX0705-001。

^②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6。

^③ 反动学术权威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对知识分子的蔑称,那一时期学校停课,学术大倒退。

^④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而“把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这“两个估计”,像两块巨石压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大批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诬为“反动权威”、“臭老九”,惨遭迫害,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

^⑤ “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学校、机关到农村逐步展开,学校师生、干部到工农群众普遍卷入,各系统、各单位的领导权都被“造反派”头头掌握,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党政领导机构瘫痪,党员组织生活停止,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受到干扰。

侯光炯(左一)与学生们一起进行土壤普查^⑥

他 60 多岁了。劳动改造和批斗会,对他的家庭很有影响。他夫人受不了,本来长期就有慢性病,心脏不好,他夫人看见他每次回来狼狈的样子,心里很难过。而且当时学校的环境很乱,整天大喇叭批斗,对他爱人有很大的影响,他夫人的病情也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严重。

侯光炯的夫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去世的,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了,但是夫人的离世,对他的家庭以及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损失。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估计他夫人也不会那么早去世。她平时身体就不好,经不起这么折腾,这件事情对侯光炯今后的生活影响很大。侯光炯和夫人结婚几十年,夫人去世后,他也没再婚过。自此之后,侯光炯经常待在农村,不回家,因为家里已经没人了,儿女都在外地工作读书,回到家也是一个人。有时候侯光炯也会回学校住一段时间,就会把天生桥的保姆请来做饭,他的助手余杰^⑦及其爱人也照顾他,有时也靠朋友及弟子的帮忙。在生活上侯光炯孤单一个人,西南农学院这个家也无所谓家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爱人去世

后,房子还是在学校,但平时都没有人住,不回西南农学院也有这个原因。

侯光炯与土壤研究室

在科研上,本来中央支持南京土壤研究所,那里力量雄厚,名专家、名教授都在那里,但那些“权威”人士不同意侯光炯的观点,侯光炯也不随风倒。中国科学院发现侯光炯和南京土壤研究所观点有分歧,于是在 1956 年专门授权侯光炯主持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并且非常重视这个研究室,学校也为此给他配了实验室,经费由侯光炯自己管理,当时还让他当了主任,但是他为了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土壤研究上,却推辞不当。他说:“我不去当主任,不当官,我和那些人合不来。”但是最终在中国科学院的一再要求下,从 1956 年 2 月起,侯光炯开始担任土壤研究室主任一职,并主要负责管理研究室的科研工作。

侯光炯平时专注于土壤研究,对土壤研究室的具体行政管理工作过问比较少。但是在具体的科研任务上,他还是尽心分配指导,只是有些想法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做了,土壤研究室的人难免心里有些不高兴。我问是怎么回事,有些土壤研究室的人就说:

侯光炯(左一)在盆栽场做实验^⑧

^⑥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4。

^⑦ 余杰,男,1957年考入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担任土壤农化系主任、西南农业大学中心实验室主任等职,主持并参与多项课题,如“三峡库区水面种植试验研究与示范”、“三峡水库移民安置区坡耕地改造与综合农业高产稳产样板示范区建设研究”等,并多次获奖。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704-005。

^⑧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6。



侯光炯(中)指导青年教师观察土壤结构^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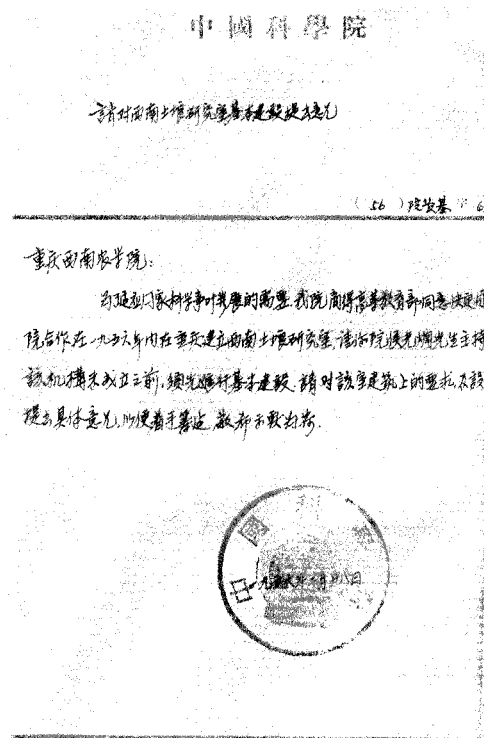
“侯老师变得很快,才把工作布置了,没过几天,他又变了,我们赶不上。”我也不好干涉侯光炯什么,他的思想倒是经常有一些变动,这个变化着思考问题也是允许的,不能说什么。他的科研思想变化快,又很超前。他说土壤是有生命的,受阳光、雨水、气候的影响,他又说生命是好东西,这个大家听了都笑。后来他就开始研究空气、温度、热、雨水等对土壤的影响,当时我也觉得这个新鲜东西,很感兴趣。但是侯光炯研究了一段时间,南京土壤研究所就有人开始反对了,后来他自己也没有研究这个理论了。所以土壤研究室的人总觉得刚布置的工作,才开始着手干,没过多久侯光炯又开始调整了,确实有些赶不上。



1984年侯光炯(左二)与农民一起收割试验水厢小麦^⑩

其他因素对侯光炯和土壤研究室的影响

土壤研究室 1956 年成立,但是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本上就停止工作了。文化大革命对侯光炯的事业和土壤研究室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还有一些因素也影响了侯光炯事业以及土壤研究室的发展。



1956年中国科学院要求学校对土壤研究室基本建设提出意见的函^⑪

一是没有加强领导。尽管中国科学院很支持土壤研究室,让侯光炯另立学派,但是科学院没有派干部领导。土壤研究室在体制上是单独的,不属于西南农学院,学校只是代管,毕竟不是我们的单位,很多事情要科学院来决定,经费也由科学院拨。虽然在业务上西南农学院支持侯光炯,但很多事情我们也没有权利去决定。如果科学院把这个土壤研究室完全交给学校领导,把经费也拨给学校,这样我们就好办了,我们还可以把学校的力量结合起来和侯光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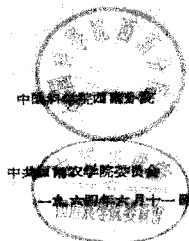
^⑨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6。

^⑩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3。

^⑪ 重庆土壤研究室工程,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6-行政-56。

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
中共西南农学院委员会 协议书

- 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与西南农学院党委为了加强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的工作，特订立本协议。
- 双方协议内容如下：
- (一)关于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的建制和领导体制保持不变，人员编制定为20人。
- (二)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的经常工作，包括科学研究工作的管理、人员调配、思想政治工作及剩余人员的处理等，由西南农学院党委负责。

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就土壤研究室
与西南农学院签订的协议¹²

起搞研究，但是这个机构是独立的，很多事情我们也不好说。土壤研究室有个党支部，他们的党组织关系在西南农学院，但是业务上我们不能指挥，只有侯光炯亲自指挥，但侯光炯常年待在农村，没有固定在学校也不好管理团队。

二是人员新。土壤研究室成立以后，学校调了



侯光炯(左二)在长宁指导农民观察秧苗¹³

40个人给研究室，可惜时间短，才调来的毕业生刚参加工作，需要一个锻炼熟悉的过程，刚干了几年，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工作也停止了。十年动乱，没有搞什么研究，也没有出什么成果，所以研究室的人才没有培养起来。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时间再长一点，这些人才也会慢慢形成。

三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团队。侯光炯在观点上与



1993年侯光炯(左三)在长宁相岭指导学生观察土壤自然剖面¹⁴

南京土壤研究所有分歧，所以他另立学派，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敢另立学派，敢于挑战权威，但是没有一个团队来帮助他。本来都是搞土壤研究的，过去都是一个研究方向，但是解放后，侯光炯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却遭到南京土壤研究所的反对。其实侯光炯的很多观点、想法都是对的，只可惜没有更多人支持，在那种权威的压制下，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坚持是不够的。如果侯光炯有个稳定的团队，他的想法大家弄懂了，帮助他实现也可以，但是人员不固定，侯光炯的思维变得又很快，别人跟不上，连个帮助他思考的助手都没有。

总之，文化大革命对土壤研究室的发展影响很大，同时对侯光炯这一代老知识分子，在业务上耽搁也很大¹⁵，本来他们已经六七十岁了，再耽误上十年，损失非常大。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后，侯光炯要拼命地干，也想把这段时间补上去，再加上对家庭没有什么

¹² 土壤研究室有关材料，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3-党群-78。

¹³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5。

¹⁴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22。

¹⁵ 文化大革命期间，谁搞教学和科研工作，就被认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货色”而遭到批斗。科学研究工作被迫停止，科研材料和资料也遭到毁损。



侯光炯(左一)在万水岭指导做地貌沙盘^⑯

牵挂了,所以他就一心在农村,一心搞土壤研究。侯光炯一辈子扎根农村,处处为农民着想,为农民服务,精神可嘉,他对农民的感情和想给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但侯光炯在事业上没有一个稳定的团队,助手又稳定不下来,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特别是在农村,好多人也不习惯和他长期在一起,没有得力的助手,他年纪也大了,一个人是不行的,而且一直在农村科研条件也不行。助手起码要大学生,但他在农村找了一些知识青



侯光炯(右一)向农民“取经”^⑰

年,那些人虽然可以在当地稳定下来,但是知识水平有限。学校这些助手有的也不愿意跟他常年住在农村搞土壤研究,年轻人毕竟想照顾家庭,还有他们也想在学校评职称。如果条件再好一点,可能侯光炯的成就要大很多。

现在看来,最主要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侯光炯家庭、事业以及土壤研究室的发展,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再加上一个稳定的团队,那么结果肯定不一样。



侯光炯(右二)指导学生研究树苗的土宜^⑱

后记:早在编辑整理这篇文章之前,就读过一些记述侯光炯教授的文章,我时常为侯老对事业的执着、对农民的情怀而感动,尤其是当我看到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里,90余岁高龄的侯老仍然奋战在土壤科学的第一线,仍然行走在乡野田间,我不禁百感交集。

文革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而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个十年,屈指可数。文革对侯老的影响是巨大的,走出文革的阴霾,凭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事业的爱,侯老在荒芜与贫瘠中为发展我国土壤科学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侯老曾如是说“我们享受党和国家的东西越多,欠人民的就越多。我们所做的一切要对得起人民。”正是基于这份信念,侯老就像自己研究的土壤一样,年复一年勤勤恳恳,默默耕耘。

(责任编辑 李亚勃)

^⑯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7。

^⑰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3。

^⑱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8。土宜即土壤及其立地条件对特定栽培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经济性状的适宜状况。

丹心向阳 奉献一生

——记李正清^①教授

□文/刘重来

编者按：他，曾到过革命圣地延安，在著名的“抗大”读过书，听过毛主席讲课；他，带着罗瑞卿亲笔写的介绍信来到重庆，在大后方从事统战工作；他，数十年与共产党风雨同舟，革命胜利，却功成身退；他，弃官从教，半世纪在教育界辛勤耕耘，兢兢业业……他就是共产党的真挚友、后来者的好师友——李正清教授。

1978年，当我从安徽调到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就听说系里有位叫李正清的老先生身世不凡。他参加革命很早，是属于通常所称“三八”式的老革命。他曾到过革命圣地延安，在著名的“抗大”读过书，听过毛主席讲课。后来受党的委派，带着罗瑞卿^②亲笔写的介绍信来重庆从事统战工作，还出生入死参加过重庆的地下革命活动等等，听到这些，使我不禁对这位未曾谋面的老先生肃然起敬。

我第一次见到李正清先生，是在全系教职工政治学习会上。经人指点，我才知道一位坐在角落，貌不惊人的老人便是李正清，瘦瘦的身板，剃着平头，穿着朴素，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颇有威严，清癯的脸

显得十分严肃，后来一接触，才知那是假象，实际上他是位十分和蔼的人。我心里有些奇怪，有如此不凡经历的人，早就该是个大干部了，怎么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呢？这是一个谜。这个谜直到1997年1月1日他去世时，我才似乎有些明白。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遗像两边挂着醒目的挽联：

数十年与共产党风雨同舟 正正堂堂 真挚友
半世纪在教育界辛勤耕耘 清清白白 好师长
这幅挽联，是曾任历史系系主任，时任西南师大副校长杨光彦^③教授写的。它巧妙地把“正清”二字嵌了进去，又十分恰当地概括了他的一生。那谜底，似

^① 李正清(1917—1997)，男，曾用名李定一，四川忠县人。曾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咨询监查委员会会员，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员会顾问，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员会常委、副主任、顾问，政协重庆市委员会第一至八届委员，农工民主党西南师范大学支部主委，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03-SW0709-014。

^② 罗瑞卿(1906—1978)，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四川南充人。新中国成立以前，曾任红军第四军纵队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教育长，抗大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等职。建国后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75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军委常委、秘书长，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③ 杨光彦(1937—1999)，男，贵州赤水人。曾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西南师范大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03-SW0712-033。

乎也就在其中了。

一、追求进步,奔赴延安

1917年6月,李正清生于四川忠县。20岁前,他从忠县明新小学、忠县县立初中、万县师范到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似乎一帆风顺过着学生读书学习的单纯生活,但在他内心却十分不平静。当时的四川,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交通闭塞、贫穷落后、民不聊生。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愤愤不平,但又不知出路何在,他渴求真理,愿为国家民族施展抱负,不愿浑浑噩噩了此一生。正在他彷徨苦闷之时,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了。不久,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国破家亡,使全国人民心急如焚。

正在此时,李正清听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已改编为八路军,正在沦陷区和日寇进行浴血战斗,并取得了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还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使全国人民深受鼓舞,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和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坚持抗战到底,才能挽救中华民



李正清(摄于1988年11月)

族的危亡,个人也才有前途。

当时,到延安去,到革命的圣地去接受教育和锻炼,成了有志青年最向往的道路。于是,李正清和爱人陶顺文商量,准备一起去延安,接受革命的洗礼。正在此时,李正清的青年朋友肖道履也来约他一道去延安。然而不巧的是,正当他们要上路时,李正清突然胃大出血,住进了成都肖氏兄弟医院。肖道履见他病情严重,卧床不起,只好一个人先走了。李正清心里着急了,还未等病完全好,就急着要出院去延安。他找到同乡秦德君,由他转托郭春涛(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信给周恩来,一封信给林伯渠^④。林伯渠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凡是要到延安,必须经西安办事处办手续。

约十月底,李正清和陶顺文从成都出发,开始了延安之行。到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老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很快办完了手续。当时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山川,他俩无钱坐汽车,全凭两条腿,还要通过国民党的层层关卡。但他们下了决心,再困难也要去延安。在路上,他们碰到不少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延安。

二、难忘的“抗大”生活

延安高昂的抗战精神,团结民主的气氛,使李正清耳目一新,这里的一切像磁石般把他深深吸引住了。经过口试、笔试,李正清被录取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成了第三期学员,陶顺文被录取进了陕北公学,两校相距不远。从此,他们开始了军事化的学校生活。

当时抗大学员编为三个大队,一个是军事大队,一个是政治大队,一个是女生队。李正清被分到政治大队,政治大队的课程安排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治课程有马列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形势教育、民众运动等;军事课程有战略学问题、游击技术、

^④ 林伯渠(1886—1960),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名祖涵,号邃园,湖南安福(今临澧)人。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农民部长、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后参加南昌起义,任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红军到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办事处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多次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军队政治工作等。教员有党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从大后方来的知识分子。李正清那一期是毛主席讲政治形势,艾思奇^⑤讲哲学,任白戈讲政治经济学,滕代远^⑥讲战略学,罗瑞卿讲军队政治工作。上课是露天,有时站着听,有时席地而坐,用膝盖当课桌记笔记。虽然已是天寒地冻,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

最难忘的是毛主席给他们作形势报告。毛主席穿着朴素,修长的身材,浓黑的头发,睿智的大眼,吸引着全场的几百名学员。他对抗战形势精辟的分析,生动的比喻,加上有力的手势,震动着大家的心。学员们屏息聆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全场鸦雀无声,讲到精彩处,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整个操场都沸腾了。记得一次毛主席正在给大家上大课,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气温骤降,毛主席停下来,环视了一下操场上的学员,大声说:“同志们,怕不怕冷呀?”学员们齐声回答:“不怕冷!”毛主席点头微笑着说:“不怕就好,我们面前的路,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只要我们不怕,下决心去克服他,那么,出现一个困难,我们就克服一个,出现多少,我们就克服多少,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吓倒我们。”听了主席的报告,大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觉得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看到了光明前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除了上课外,学校更多的是组织自学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收获就更大了。

延安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小米饭、熬白菜汤,是抗大天天、顿顿的伙食。大家东一堆、西一堆,就蹲在露天地里吃饭。开始大家吃不惯小米,渐渐地也就习惯了。晚上睡觉,几个,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土坑上,有时连翻个身都感到困难。而每月领到1元津贴费,只够理发、买牙膏肥皂什么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昂,精神生活愉快且丰富。

当时抗大的歌咏活动十分闻名,操场上、课堂

里,白天、晚上,都可以听到学员唱歌。特别是在集会上或上大课的休息时间,各个队之间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大家经常唱的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游击队歌》、《抗大校歌》等等。几十年过去了,李正清还记得那雄壮、充满激情的校歌: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
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
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为了作好上前线和打游击战的准备,抗大还经常组织学员进行军事拉练,他们常以小队为单位,举行爬延安宝塔山活动,并开展比赛,既锻炼了身体,又进行了军事训练。

每天,李正清都是和学员们在紧张、欢快的气氛中生活学习。在延安街头,他们经常可以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抗大的学员,常常把毛主席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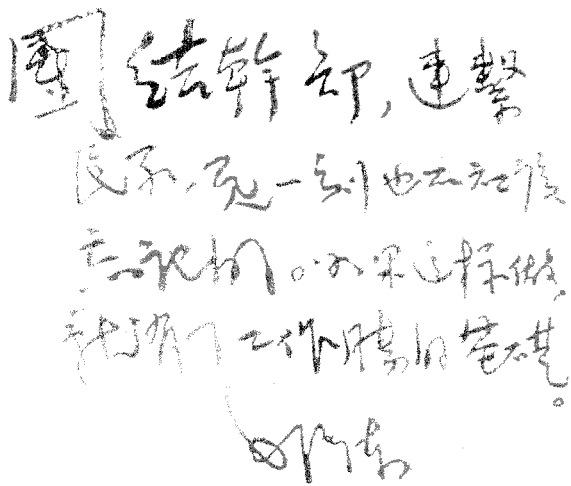
^⑤ 艾思奇(1910—1966),男,中国哲学家。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长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工作。1937年到延安,曾任抗大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秘书长、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⑥ 滕代远(1904—1974),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湖南麻阳人,苗族。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湘东特委、湘鄂赣边特委书记。1938年起,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后兼铁道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是中央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着,和他随便聊天。毛主席平易近人,笑容可掬地和
大家交谈。这和国民党的大官们出门时一路前呼后
拥,戒备森严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珍贵的题词

时间很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到了1938年夏天,
这一期学员该毕业了。记得毛主席对第三期学员说:
你们到抗大来学习,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徒步八
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
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最重要的还
是第三课,这就是要到实际斗争中去学习锻炼。同学
们都争先恐后报名上前线,投入到抗日的战火中去。
但非常不巧的是,李正清此时胃病再次发作,吐血不
止,身体十分虚弱,但他还是坚持要求到前线去。此
事被抗大副校长兼教育长罗瑞卿知道了,就找他谈
话,当罗瑞卿询问了他的病情后,就亲切耐心地劝导



毛泽东题词

他说:“目前延安医疗条件太差,你的病这样重,补血
的针药在前线都很缺少,这里就更没法找到,你还是
回四川去,一方面治病,一方面直接和当地组织联
系,作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管在哪里,都一
样是干革命嘛。”李正清只好答应了。罗瑞卿亲笔为
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叫他到重庆去找吴玉章^⑦。

临行前,李正清多想请毛主席给他题词留念啊。
可巧就在结业的前一天,毛主席又一次来到抗大给
学员做报告,当报告结束时,李正清和其他几个学员
不约而同地把早已准备好的纪念册、笔记本掏出来,
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很高兴,当即挥笔一一题词。
大概要求题词的学员多,又很匆忙,因此,在一挥而
就中,给李正清的题词还漏写了一个“利”字(见左
图)。

毛主席题词是:“团结干部,连系民众,是一刻也
不应该忘记的。如果这样做,就有了工作胜(利)的基
础。”

抗大的校长林彪^⑧和抗大的老师罗瑞卿、许光
达^⑨、滕代远、徐以新等也都在李正清笔记本上题词
赠言。

罗瑞卿的题词是:“望速把握现有优良条件,克
服困难,以完成解放民族之使命。”

许光达的题词是:“掌握着斗争的艺术,以少的
力量战胜多的敌人,以小的牺牲获得大的胜利。”

滕代远的题词是:“我们是抗大的优秀学生,我
们是抗战的先锋战士,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而斗
争。”

徐以新的题词是:“创造新中国是我们的目标,
为着这一目标,任何艰难困苦和牺牲在所不惜,而且

^⑦ 吴玉章(1878—1966),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原名永珊,号树人,四川荣县人。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中共第六至第八届中央委员。

^⑧ 林彪(1907—1971),男,中国军事家。原名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湖北黄冈人。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文化大革命”中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后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被开除党籍。

^⑨ 许光达(1908—1969),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名德华,湖南长沙人。曾任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抗大第三分校校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二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7年兼任装甲兵学院院长,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抱定必成必胜之信心。”

可惜的是,在“文革”期间,因罗瑞卿被诬陷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打击迫害,他的题词也被撕毁了。

四、苦读马列著作

李正清回到重庆后,吴玉章热情接待了他,对他说:“你现在身体还十分虚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先把身体养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再就是趁此机会多读点马列著作,以便更好的为革命工作”。

当时的重庆,进步青年要想读马列的书,谈何容易。不但难以寻觅到,而且还要冒很大风险。到哪里去读马列的书呢?突然,他眼睛一亮,想到了邹韬奋^⑩办的生活书店。

邹韬奋,是著名的爱国学者、进步的政论家和出版家,他创办的生活书店,以出版和销售马列经典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而闻名全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进步青年中享有很高声誉。在那黑暗的年代,它是一个进步的文化堡垒,在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李正清心想,何不到那里去读马列的书呢!

生活书店座落在重庆武库街(后改名民生路),店面并不大,但吸引着无数进步青年。每天清晨,当书店门一开,李正清就迫不及待地挤进了书店。那时候,生活书店趁国共合作的机会,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那一排排书架上,摆满了诸如《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法兰西内战》、《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等马列著作以及大量进步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刊。特别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毛主席著作也摆上了书架。看到这么多好书,李正清非

常兴奋。但当时他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常常是身无分文。吃饭尚且成问题,更何况买书了。他只能天天来书店站着看书。有时站得两腿发麻,还舍不得放下书。时间长了,他的刻苦学习的劲头,引起了邹韬奋的注意。

那是1939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李正清照例一早就来到生活书店。这些天,他正如饥似渴地阅读刚出版的《资本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精辟论述以及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有力论证深深吸引了他,使他全神贯注,忘了一切。常常是书店要关门,他才依依不舍放下书,怏怏离去。这一天,李正清正手捧《资本论》聚精会神地看着,突然,一个身穿西装,戴眼镜,面带微笑的中年人向他走来,这就是邹韬奋。邹韬奋一连好多天都看到这位穿着单薄,清瘦的年轻人在专心致志阅读《资本论》,觉得有些惊奇,产生了好感。他打量着李正清,和气地对他说:“你天天都来这里读《资本论》,既这么喜欢它,何不买回去细细读呢?”李正清脸红了,只得抱歉地向邹韬奋说明自己没有职业,没有钱买书,只能每天来书店看书。邹韬奋望着眼前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略一沉吟,转身从书架上取下一套三本精装《资本论》,在手里掂了一下,毅然送到李正清手里说:“你喜欢读《资本论》,这很好,你就把这一套拿回去看吧!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把钱送来,实在没钱,就送给你”。李正清手捧着三册沉甸甸的《资本论》,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时他才知道,面前这位和蔼可亲,送他《资本论》的先生正是他仰慕已久的邹韬奋。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想起几年前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七君子案”,当时,邹韬奋和沈钧儒^⑪、章乃器^⑫、李公朴^⑬、沙千

^⑩ 邹韬奋(1895—1944),男,中国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祖籍江西余江。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曾担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日战争后,先后在上海、汉口、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后因癌症病逝。

^⑪ 沈钧儒(1875—1963),男,中国民主革命家。曾参加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1949年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

^⑫ 章乃器(1897—1977),男,浙江青田人。曾任安徽省政府财政厅长、重庆上川实业公司总经理、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45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建国后,任粮食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⑬ 李公朴(1902—1946),男,中国爱国民主人士。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曾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为负责人之一。1945年任民盟中央委员兼教委会副主任委员,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1988年11月11日,笔者与李正清同志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10次代表大会时,在长城合影。

里^⑭、史良^⑮、王造时^⑯等爱国人士均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他们提出了团结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的要求,惹怒了国民党政府,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逮捕。邹韬奋等人在监狱里大义凛然,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记得邹韬奋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义正辞严地说:“如果爱国有罪,我愿永远坐牢!”他们坚持真理,坚持爱国的立场和坚贞不屈的精神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诚。如今,他敬仰的邹韬奋就在眼前,还送他一套《资本论》,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李正清感慨地说:“这件事对于一贯热爱青年、关怀青年成长的邹韬奋先生来说,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它凝聚着邹先生对青年的殷切期望。”几十年来,这套《资本论》一直伴随着他,不论是

在颠沛流离的地下革命期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他都细心保存着。

五、加入民主党派,开展地下斗争

李正清回到重庆后,牢记罗瑞卿在延安临别时对他的指示,在大后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得到组织上的帮助和支持,1945年,经周新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又经郭仲衡^⑰介绍,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此时,抗战已胜利,然而蒋介石又大搞专制独裁,破坏国共合作,挑起内战。李正清又投入到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1947年6月,农工重庆市委成立,李正清与王善继、郭仲衡、章培毅、王希哲等8人被选为市委委员,李正清还兼任宣传委员。为了革命活动需要,他到重庆辅仁中学任教员兼高中部主任,秘密联系附近的大中小学的进步教师和学生,进行针对国民党的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

1947年国民党加紧了对民主党派的迫害,不少民主党派成员被捕,李正清没有被吓倒,还参加了营救入狱战友的活动。1947年10月,农工中央机关迁至香港,11月,民盟总部被解散。为了得到中央的指示,这年年底,他和章培毅(农工民主党重庆市负责人、章伯钧^⑱之侄)一起去香港,向农工中央总部汇报工作。

时任农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

^⑭ 沙千里(1901—1982),男,上海市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军管会和市政府副秘书长,并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地方工业部长、轻工业部长、粮食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⑮ 史良(1900—1985),女,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江苏常州人。九一八事变后,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并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委员。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历任司法部长、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

^⑯ 王造时(1903—1971),男,江西安福人,原名雄生。曾创办《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自由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著译《历史哲学》等。

^⑰ 郭仲衡(1933—1993),男,中国应用数学与力学家,广东广州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波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⑱ 章伯钧(1895—1969),男,安徽桐城人。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1947年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1949年参加筹备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人士彭泽民^①热情接待了他们。彭泽民当时已年过古稀,他家门口挂着“国医彭泽民”的牌子。原来彭老在香港以中医职业为掩护,主持农工中央工作。他医术高超,在香港享有盛誉,被称为“一代神医”。李正清和章培毅当时都是三十岁出头的青年人,但彭泽民在他们面前没有一点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他详细询问了农工党在重庆的活动情况,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并向他们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认为国民党政权已到了途穷末日,作为民主党派,要和中共一起,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努力奋斗。彭老鼓励他们多学习革命理论,广泛联系革命知识分子,发展农工党组织,壮大进步力量。

1948年夏,李正清、章培毅回到重庆。不久,章培毅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白公馆监狱殉难)。李正清担任了农工党重庆市委代理主任委员,他来到青木关中学任教务主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国民党末日临近,更加紧了对革命人士的迫害,李正清在学校组织了抗议、揭发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志士血腥镇压的罪恶行径。他代表青木关中学,参加了重庆十院校罢课罢教委员会,组织领导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国民党当局将李正清列入黑名单,要抓他。他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安排好农工党重庆组织的工作,传达了上级关于“保护城市、保护工厂、保存物资,掀起护厂、护校运动,迎接解放”的指示精神,然后化装成工人,再次到香港农工中央总部请示和汇报工作,这时已是1948年底,全国解放已不远了。

六、重任在肩,不辞劳苦

李正清到了香港,才知彭泽民已应中共邀请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了。李正清在组织安排下,也乘船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他参加了

1949年11月召开的全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第五次干部会议(即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生死存亡。当时,参加会议一部分代表认为如今革命已成功了,新中国已建立了,民主党派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而主张取消中国农工民主党,来个“光荣结束”。另一部分代表虽然不同意解散组织,但又不敢理直气壮地去力争。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于11月22日邀请章伯钧、彭泽民、季方^②等农工党领导人座谈。周恩来说:“农工民主党不同于中共以外别的党派者,它是唯一具有革命传统基础的党。”认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和其他几个民主党派都还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要和共产党继续长期共存下去。周恩来的话,给代表们极大的鼓舞,中国农工民主党终于得以存在和发展下去。

1950年1月初,李正清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农工中央和民盟中央的重托,回重庆整理农工党组织,并协助楚图南^③、萧华清等同志整理民盟组织。这一年是他一生最繁忙,最活跃的一年,不少活动,清楚地记载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党史和有关的文件档案之中:

1950年1月:农工党重庆市整理党务委员会成立,由李正清、黄朋豪、罗任一、唐万延、周竟波、傅濬6人组成。决定着手进行党员登记。根据农工中央指示,并与中共西南局统战部协商,决定暂不设四川省组织,省党部停止活动,只在成都、重庆建立组织。

2月:李正清、刘宗宽、罗任一、黄朋豪被选为正式代表,出席重庆市各民主党派解放后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

3月:农工党重庆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李正清被选为副主任委员。

6月:李正清、黄朋豪应邀出席重庆市各民主党

^① 彭泽民(1877—1956),男,广东四会人。1930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1947年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委会主席。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

^② 季方(1890—1987),男,江苏海门人,字正成。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1940年进入解放区,任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中行政公署主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华东军区解放军军官教导总团团长。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和名誉主席。

^③ 楚图南(1899—1994),男,云南文山山人。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和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派在胜利大厦举行的联欢会。

7月：李正清被任命为重庆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农工重庆临委组织百余名党员走上街头，进行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的宣传活动。

9月：农工重庆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机关月刊《渝讯》编委会，李正清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11月：农工党重庆市临委与重庆市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发表谈话，拥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1月29日，农工重庆市临委在胜利大厦集会，悼念邓演达^②先生及在“中美合作所”殉难的农工党员黎又霖、章培毅、张孟晋。

12月：农工党重庆市临委会成立反霸减租退押协进委员会、税收促成委员会、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

然而正在这时，肃反镇反开始了，重庆的农工组织有9名党员被捕（现已平反），李正清因曾举荐过其中一些人而受到了牵连。4月，农工党重庆市临委会召开党员大会，传达农工中央对重庆组织的决定：“成份复杂，组织不健全、停止对外活动，对内彻底清理。”从此，李正清被排除出农工重庆市委领导层。但逆境并没有使他消沉，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方式。

七、弃官从教，良师益友

李正清从青年时代起就对马列主义理论有浓厚兴趣。如今革命胜利了，对仕途并无兴趣的他，深感对党派工作力不从心。因此，他要求到学校工作，一方面可以向青年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一方面可以继续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1950年，他被求精商学院、正阳法商学院聘为教授，讲授《政治学》和《社会发展史》。不久，又担任正阳法商学院院长兼教务长。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1952年又去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深造。1952年调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一直到他1997年逝世。

40多年来，他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工作，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课程。他曾费数年时间，写有一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书稿，可惜此书稿在“文革”时怕惹火烧身而被付之一炬。

在校期间，李正清先后被选为农工中央咨监委员，农工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和北碚区委顾问，政协重庆市委第一至第八届委员和农工西师支部主委，北碚区政协老委员联谊会会员。但他淡泊名利，从不居功自傲，从不炫耀自己。他十分热心党派活动，严格要求自己，市里通知他开会，不管刮风下雨，他都按时参加。他晕车，只能坐那种车窗都不全的破烂车子。学校的组织生活会，他也是坚持参加，从不迟到早退。对学生，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青年教师，他热情关心，从不摆架子。因此受到广大师生的尊敬。他身体自小就羸弱多病，为了强身，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用冷水洗澡擦身。记得1988年我和他在北京京丰宾馆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同住一室，他是天天冷水擦身不间断。

李正清先生是我的良师，也是我入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介绍人，我们是一个系的同事，还是茶友。他生平的一大嗜好是坐茶馆，这也许是他解放前作统战工作，广交朋友留下的一个习惯。他十分节约，当时的茶馆，可以自带茶杯、茶叶，茶馆供应白开水，这样就便宜得多。记得他常常带的是一只多处碰破了瓷皮的小搪瓷茶缸，喝的是各种茶叶混合的“茶叶末”，每喝一只茶，都要吹一下飘浮在茶水面上的茶末。一次我买了两把宜兴茶壶，送了他一把，他很高兴，爱不释手，每次喝茶，都小心翼翼从包里捧出这把宜兴壶来。在品茗之中，他常常向我讲起几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使我对中国农工民主党有一个很亲切、生动的认识，也对他更加尊敬。

在公众场合，他不善言辞，在民主党派的会议上，他也极少发言，但发起言来，中心思想很明确，那就是要时时刻刻牢记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要旗帜鲜明，永不动摇。

说心里话，当年我之所以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也是因为我第一个接触的农工党员就是李正清，他的高尚人品深深吸引了我。我是从他身上开始认识并自愿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的。

（责任编辑 李亚勃 唐朵朵）

^② 邓演达（1895—1931），男，广东归善（今惠州）人，字择生。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强调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做斗争。后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总干事，进行反蒋斗争。193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周总理究竟来过学校没有？

□口述/李兰^① 整理编辑/李亚勃

编者按：周恩来总理究竟有没有来过我校，这一问题在学校一直存在争论。之所以会出现争论，是因为有人质疑：如果周总理来过学校，为什么没有留下相关报道，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但是在我校的校史展览馆领导关怀篇里却赫然展示了周总理来校的情景。然而据知情的老教师说，校史展览馆里展出的照片——“1957年10月，周恩来总理来校视察离校时师生热烈欢送的情景”其实是电脑合成的，并不是真实的照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周总理是否来过学校这件事，确实是众说纷纭、疑云重重，但作为重要的校史事件，我们有必要弄清历史的真相。为此，我们带着疑问采访了当年亲历历史的见证人——李兰。据时任西南农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兰回忆：

1958年4月的一天下午2点多，像往常一样，我骑着自行车从家（李兰家当时在西南师范学院行政楼背后的山坡上）去西南农学院上班。当骑车下坡经过美术学院时，突然看见有汽车从西南师范学院正门开过来。为了避让汽车，我从自行车上下来。我推着自行车站在路边，正好看见市里公安局长岳林从汽车上下来，我上前打招呼：“岳局长，你咋来了？”岳局长小声回答：“总理过来了，我保卫。”我吃惊道：“总理来了你给学校打个招呼嘛！”岳局长摇

头：“不，总理说不，路过，来看看。”这时总理从后面的车上下来，走到毛主席像前看看，又围着塑像转了一圈。正在校门口劳动的学生带着草帽，扛着锄头，一看见总理就喊：“周总理！”警卫一听十分紧张，此时周总理也正要走，警卫马上护送他上车，车立刻开走了。从周总理到达学校，到离开，就几分钟。

通过李兰的回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周总理确实来过学校。但是李兰记忆中周总理来校的时间与校史馆展示的时间不一致。为此，我们特向全校老教师及校外老校友求证：周总理是什么时候来到西南师范学院的？是否有总理来校的相关材料？

如有知情者，请与我们联系：023-68367435
xdjy2009@126.com

（责任编辑 蒋 涛）

^① 李兰，女，1938年7月在山西参加抗日工作，此后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晋绥分区党校、中共晋绥八地委、中共吕梁区委、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等处工作，1954年底调入西南师范学院任办公室主任一职，1956年调入西南农学院，历任学校党委副书记、书记。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LX0705-001。

张鲁 张鲁

□文
邓力



张鲁

“山那边是海”，是张鲁创作的第一部电视剧，李半黎先生题写的片名被精心装裱后挂在客厅，1990年代初，第一次采访张鲁，我们就坐在匾额下。采访之前对张鲁的了解，全部来自同在校报供职的何卫东，他曾一次次地向我提起张鲁是何等的非同小可。

张鲁毕业于西师中文系78级。1.80米的个头，阳光帅气，喜欢拳击、足球一类体育运动。球踢得不咋样，讲故事写文章，却是好手。1982年的夏天，他

张鲁^①，你那边，是否有山？山的那一边，是否还是海？
不管如何，三生石上，我们消磨着的今生永远不及来生悠长，那边的山，那边的海一定无比的宽广辽阔，你不再需要那把难说好恶的轮椅，你真的站起来了。

没去指定的学校教书，听说重庆南泉那边，在拍电视，张鲁去了南泉，1.80的个头往导演面前一站，要参加拍摄，被导演咋呼去先抬木头。张鲁巴望抬木头开始的苦命电视不要老抬木头，干了一段时间，便与几位好友邀约，拉起个“重庆青年摄制组”，5万元起家兴业，一年后，张鲁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电视剧《山那边是海》。又三年，张鲁创作了《昨天·昨天的故事》、《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希波克拉底誓言》，分别获1985年和1986年“飞天”一等奖。

短短几年，张鲁令业界刮目相看，人们在等待张鲁，要听他“下回分解”时候，张鲁却突然销声匿迹了。1987

年，适逢国内电视剧作者聚会，人们发现，风头正盛的张鲁没来，张鲁怎么可以不来？这样的盛会怎能少了张鲁？张鲁却是真的不能来了。

知情者一脸如霜，泪花闪烁。

那年3月，一个多雾的清晨，张鲁依然像往常一样在公路边上晨跑，被沙石公路上的一辆越道驶来的货车往腰脊一撞：骨片切断中枢神经！

张鲁被急送医院，医生尽力抢救，人们祈望只是

^① 张鲁(1952.6—2010.11)，重庆人。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国家一级编剧。创作或改编《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希波克拉底誓言》、《南行记》、《边寨人家的历史》、《人生哲学第一课》、《陈小梅进城》等作品200余部(集)，多次获中国飞天奖一等奖、最佳编剧奖。曾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获“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

恶梦虚惊,同为青年摄制组的好友、导演潘小杨从外景地飞奔来到病床,放声大哭张鲁命苦,哭毕又奔向四川江油。民间盛传江油的严新气功灵验,说得神乎其神,潘小杨希望大师也能够让张鲁“扔下拐杖就跑”。奇迹没有出现,张鲁腰部以下部位全部瘫痪。

在别人看来,张鲁惨了,有人说,张鲁在集攒安眠药,有人却看到了张鲁在病床上一次次将沙袋艰难地举过头顶。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张鲁?是我要采访的核心内容。望着坐在轮椅上的张鲁,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寒暄点什么,倒是张鲁先说话。

从医院回来的张鲁,坐在轮椅上的张鲁,带着浅浅的微笑,先为我讲了在北京治病期间亲历的笑话。说是陪同他去北京的重庆护工,有天早上去医院外面买早点回来,一脸的惊讶,对张鲁说,北京人不得了,连卖菜的都会说普通话,而且说得比咱重庆的播音员还好,从此对北京人敬佩不已。

张鲁讲的笑话,让我流泪了,不为其他,只为张鲁的坚强。我坚信,有笑侃苦难人生心态的张鲁,已对命运的一种可能说了“不”。他要站起,要让精神站起来。不过张鲁也承认,好长一段时间,他不敢正视现实,每天早上醒来总以为是一场梦魇。潘小杨此时却拿来了《黑豹突击队》的构思,硬了心要轮椅上的张鲁执笔。碍于情面,不好埋怨,不便拒绝的张鲁,忍着病痛的折磨开始新的创作。当张鲁把《黑豹突击队》写就,蓦然悟道:导演电视的潘小杨这回把我张鲁导演了。继那以后,张鲁接二连三推出新作,“飞



和轮椅一道四处“行走”^②

天”也不忘故人,又一次次把荣誉的桂冠戴在张鲁头上。尤其是改编的《南行记》系列,1991年获“飞天”一等奖后,又获首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首届中国电视节目展播一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第一次采访后,与张鲁的接触渐多,知道他在泥泞的巴渝山路上,为自己首倡的《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奔走,坐在轮椅上的艰难奔走,却让数十所希望学校、希望书屋建了起来,上万名像“细小雨”那样的儿童获得帮助。

2004年中秋节那天,教育部通知各直属高校要在10月20日前上报相关校园歌曲。当时的西师一直没有这类歌曲,我向学校推荐张鲁写一首。我知道校歌难写,时间又太紧,有些为难张鲁,没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找上门去。张鲁分明犹豫了一下,还是带着浅浅的微笑答应了下来。几天以后,张鲁通过邮箱发来《献一片丹心铸我师魂》。歌词起句不凡,“山高缙云,水流嘉陵,高山流水聚知音”,让见怪了“缙云巍巍,嘉陵滔滔”的我辈大喊过瘾。请郑建鸥老师谱曲后,在规定时间内上报教育部。

张鲁走的那天,我蓦然想起了《献一片丹心铸我师魂》,尤其是下阙记得特别的清楚,絮絮叨叨地念着,念给张鲁:今宵书香来日路长/今宵来日证此生。/杏橘桃李百花笑,/天地人和万象新。/国号中华史记千秋,/中华千秋当记取,/复兴从来教育始,/教兴才兴民族兴。/知百代大业在树人,/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喜桃李八方敢争春,/献一片丹心铸我师魂。

天妒英才,让张鲁才华横溢,却又狠心让张鲁的才华只能在轮椅上磨蹭。感动于张鲁,让自己的轮椅人生磨蹭出了奇迹,尽管我们并不愿意看到这奇迹的创造是一个如此的开局。当完成大约200多部(集)剧本、完成三卷本长篇小说《卢作孚》以后,张鲁走了。张鲁以他的方式告诉我们,轮椅上坐着的张鲁比站着的人做得更多,更出色。人生本没有意义,需要我们为自己确定一个意义,——毕淑敏所说的,有人所做的,我们所榜样的,都有了。——我说的是张鲁。

(责任编辑 杜玫娟)

^② 图片来自网易新闻中心 <http://news.163.com/10/1113/02/6LBAGKHM00014AED.html>。



□文/姜海庭

编者按：从西南大学六号门朝着融汇南路向北去，一条林荫小道旁边屹立着一栋古典的近现代建筑——第三十四教学楼，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和阳光，他就像一位长者讲述那些关于楼、关于人、关于美的故事，让我们驻足聆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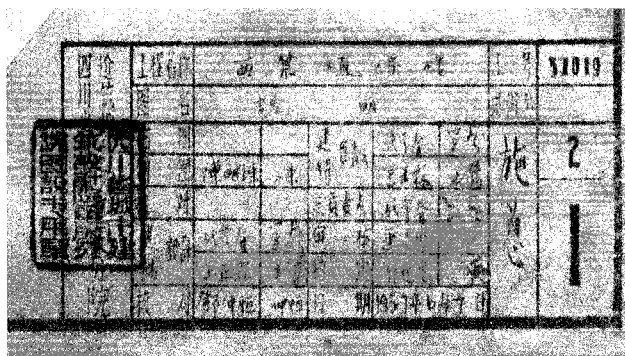


阳光下的第三十四教学楼正门

在美丽的晨曦中，迎着和煦的晨风，从西南大学六号门朝着融汇路北去的方向前行，在经济管理学院大门斜对面的路口驻足右看，映入眼帘的便是第三十四教学楼。顺着林荫小道走进去，那个由挺立的四根方柱筑建而成的第三十四教学楼正门便屹立在眼前。面朝正门，凝视这栋古朴的近代建筑，就像是在聆听一位长者讲述那些关于楼、关于人、关于美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初，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刚从夏坝搬到北碚天生桥的时候，教学条件和住宿条件异常艰苦，农学系、土壤农化系、植物保护系和农业机械化系都挤在由青砖砌成的第二教学楼，而很多老师就和学生一起住在学生宿舍。第二教

学楼的楼梯是用木板做的，楼顶经常漏雨，师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教学和科研活动，而且维持了很多年。1956年左右，由于风雨的侵蚀，第二教学楼已无法承担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为了改善教学条件，学校向农林渔业部申请修建新的教学楼，最初定名为植保楼。农林渔业部经过审核后通过了这个项目，建设植保楼的经费全部由农林渔业部承担，并由西南农学院基建处承建。而后由重庆市设计院全面担任植保楼的建筑设计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和精心设计，建筑设计图于1957年4月13日^①圆满完成。同年，学校把正在建设中的植保楼更名为第四



植保楼施工说明会签栏扫描图^②

^①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7-教3。

^②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7-教3。

教学楼^③。经过八个月紧张有序的修建,一栋主体三层砖混结构的“T”型建筑于1958年2月竣工^④。

根据学校安排,植物保护系和土壤农化系陆续



刚落成的原西南农学院第四教学楼全景图^⑤

搬进修建好的第四教学楼。日久生情是一个很温馨的词语,在几十年的跋涉中,第四教学楼渐渐成为师生心中一个同甘共苦的朋友。据土壤农化系的杨德海^⑥回忆,由于资金困难,当时没有请搬运工人,大量的教学资料、办公用品和实验设备都是师生们从第二教学楼搬到第四教学楼的,而且他也参与了这次大型的义务搬迁劳动,并从中感受到了“乔迁之喜”。据毛炳衡^⑦、余杰^⑧、江育璋和付显兰^⑨回忆,第四教学

楼一楼主要是土壤农化系化学组的实验室和办公室,二楼三楼的西边是土壤农化系的实验室、东边是植物保护系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四楼中部那个100多平方米的大房间是土壤农化系的土壤标本室,后来演变成土壤农化系的教学科研陈列室,用以陈列全国各地的土壤剖面标本、土壤农化系的历史沿革图、师生的教学科研成果等等。“T”字造型的第四教学楼竖向部分的第一层是一个可以容纳100多人就座的阶梯教室,阶梯教室的上面以前是一个大平台,供植物保护系放盆栽用,现在为了防雨防漏,已经改成了坡屋顶。当时学校的很多公共必修课、大型会议、学术报告、迎新表演活动以及名师讲座都是在这



1957年土壤农化系师生在原西南农学院第四教学楼前面的盆栽基地做盆栽对比观察试验^⑩

^③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7-行政-47,第77页。

^④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8-行政-47,第15页。

^⑤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7。

^⑥ 杨德海,男,1946年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1950年至1953年先后在东北鞍山钢铁公司、吉林农科所工作,1953年调入西南农学院土化系工作,先后主持并参与了多项课题,如“磷肥对蚕食和小麦的肥效及间作中根际营养研究”、“紫云英优良菌种选育”、“五氯酚钠除草剂试制”等,并多次获奖。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714-072。

^⑦ 毛炳衡,男,曾用名毛知耘,195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毕业后先后在广东湛江华南垦殖局、广州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工作,1957年考入西南农学院土化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并在西南农学院任教。主持并参与多项课题,如“氯化铵肥科学施用研究”、“四川省肥料区划研究”、“四川主要土壤供磷水平与磷肥效应研究”、“2000年我国肥料发展预测研究”等,并多次获奖。曾荣获“农牧渔业部优秀教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407-004。

^⑧ 余杰,男,1957年考入西南农学院土化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担任土化系系主任、西南农业大学中心实验室主任等职,曾主持并参与了多项课题,如“三峡库区水面种植试验研究与示范”、“三峡水库移民安置区坡瘠地改造与综合农业高产稳产样板示范区建设研究”等,并多次获奖。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704-005。

^⑨ 付显兰,女,1959年考入西南农学院农机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任西南农学院团委副书记、书记;土化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等职。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501-004。

^⑩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里进行。

搬迁工作做好以后,教学科研活动又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自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全国各大院校开始招收一批研究生,西南农学院也陆续招收了十几名研究生,这些研究生经常在第四教学楼做实验,后来他们对西南农学院的发展以及农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现在的植物营养学家毛炳衡就是西南农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副博士^⑩之一。新修好的第四教学楼,教学科研设备齐全,土壤农化系的侯光炯、植物保护系的蒋书楠^⑪经常在阶梯教室给学生授课,在实验室指导研究生做实验,同时他们还进行相应的科研活动。据马俊英^⑫、蒲富永和赖守梯^⑬介绍,由于科研需要,学校向东北的一些院校学习在第四教学楼前修建了温室实验室。靠近实验室由北至南依次是盆栽基地和水稻实验田,大跃进时期西南农学院的浮夸风“亩产十万斤”水稻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温室实验室由准备室、四间温室和一个烟囱组成,准备室的第一层是同位素实验室,陈兆畦^⑭经常在此进行同位素农业应用的实验研究;准备室的后面是四间标准化的温室。温室实验室由苏联



1958年老师指导学生在盆栽基地进行有机肥特性研究的盆栽实验^⑮

专家援助学校设计建造,技术设备相当先进,对当时的土壤分析和盆栽试验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早在1956年,黄希素^⑯就多次邀请苏联的植物营养生理学专家赫里斯捷娃来中国讲学,1958年左右赫里斯捷娃来到西南农学院进行为期半年的讲学和研究。在这半年里,由杨邦俊^⑰全程协助赫里斯捷娃开展讲学和科研活动,晚上赫里斯捷娃住在西南农学院的专家楼,白天就在第四教学楼的阶梯教室

^⑩ 苏联时代的高等教育学历制度专家、副博士、博士,也就是现在的本科、硕士、博士。

^⑪ 蒋书楠,男,1932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先后在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大学农学院、贵州大学农学院等单位工作,1948年8月至1949年7月在美国阿华州立农工大学研究院学习,1952年11月调入西南农学院工作,历任西南农学院教务长、副院长等职。曾主持多项课题,如“天牛科分类新方法研究”、“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二化螟综合防治”等,并多次获奖。曾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四川省农业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1990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1216-002。

^⑫ 马俊英,女,1948年考入四川大学先修班,1949至1952年在四川大学土壤农化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至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参与多项课题,如“川东紫云英高产栽培技术调查研究”、“腐殖酸肥料的生产与提高肥效研究”等。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304-007。

^⑬ 赖守梯,男,1952年考入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工作,1960年调入西南农学院土化系工作,主持并参与多项科研项目,如“土壤普查技术的研究”中的“四川盆地紫色丘陵区县级土壤普查的方法程序”、“县级土壤普查方法的探讨——从璧山的土壤调查实践看外业的工作程序与方法”等。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1305-002。

^⑭ 陈兆畦(1895—1986),男,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24年于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主任、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和西南农学院土壤化学系教授等。主要研究成果有“从豆饼提取蛋白质的研究”、“同位素在农业上的应用”、“土壤酶与土壤肥力关系的研究”等。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0722-027。

^⑮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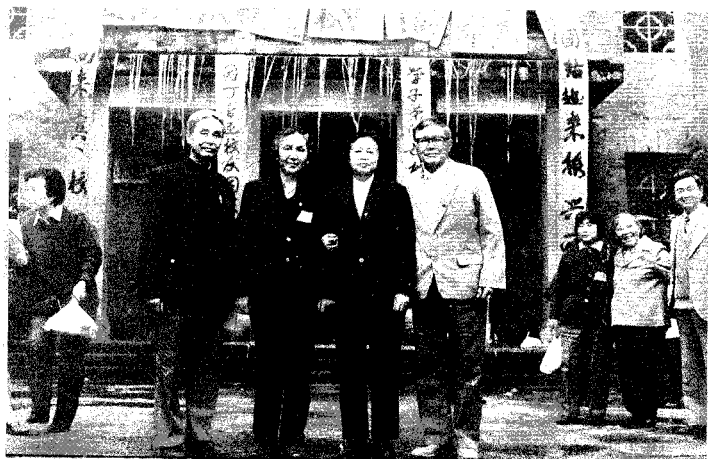
^⑯ 黄希素,男,原名黄熙寿,1947年调入重庆磁器口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并同时兼任重庆大学、重庆歇马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教授。1952年调入西南农学院土化系工作,并发表多篇科研论文,如“土壤水分对于小麦产量之影响”、“土壤固粒大小配合对于小麦产量之影响”等。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WT1107-002。

^⑰ 杨邦俊,男,1952年考入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主持并参与了多项课题,如“秸秆还田技术规程制定的研究”、“有机肥提高烤烟品质的研究”、“有机肥在改良土壤和植物营养中的作用”等,并多次获奖。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714-023。

给学员讲课,当时全国各大农业院校派了相关人员来此听课学习。学校在第四教学楼的三楼为赫里斯捷娃配备了专门的实验室和办公室,她就在此帮助我校的相关研究人员进行腐殖酸肥料^①的研究,这一度掀起了全国各大农业院校研究腐殖酸肥料的热潮。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学校停止了所有的教学科研活动,第四教学楼继而成为植物保护系和土壤农化系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阵地。师生们经常在这里开批斗会,教学楼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实验台上也堆满了大字报。在这期间,工宣队和铁道兵 8711 部队进驻西南农学院,部队住在学校里,把第四教学楼作为师部,部分实验室和办公室则变成师部领导家属住宿的地方。铁道兵在此驻扎期间,还组织修建了襄渝铁路^②,学校的很多老师也参与了铁路的修建。

文革结束后,铁道兵 8711 部队全部撤走,全国恢复高考,学校也恢复了正常招生,因此第四教学楼也重新修整以迎接新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侯光炯等一些老教授非常注重青年教师和后备人才的培养,没有教材就让青年教师跟随老教授一起分工编写教



1990年西南农业大学40周年校庆之际,部分老师在原第四教学楼前留影纪念

材、集中备课,然后在第四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进行多轮试讲,审核通过后才能进行正式的教学活动。而后这些青年教师和那些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教师,如植物保护系的蒋书楠、土壤农化系的毛炳衡等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活动中。蒋书楠专攻天牛科分类,发展了天牛科综合分类方法和高级阶元分类系统演化理论,成为中国系统研究天牛科分类的开端。他发现天牛新种 43 种,并先后荣获农业部、国家教委、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一次,三等奖三次。毛炳衡则主要从事土壤养分、植物营养与施肥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建成了西南地区唯一的“国家紫色土肥力和肥料效益检测基地”和土壤农化系盆栽场。虽然二位教授由于年龄的缘故,最终没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4年,土壤农化系更名为资源环境学院。2002年植物保护系更名为植物保护学院。2005年两校合并后,第四教学楼更名为第三十四教学楼。2009年,资源环境学院搬到了新修好的第三十五教学楼,第三十四教学楼完全成为植物保护学院的科研中心和



1982年几位老师一起前往原西南农学院第四教学楼前的盆栽基地

^① 腐殖酸肥料指利用泥炭、褐煤等原料,采用不同的生产方式,制取含有大量腐殖酸和作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氮、磷、钾及某些微量元素的产品,相当于一种有机无机复合肥。腐殖酸肥料的品种有腐殖酸铵、硝基腐殖酸铵、腐殖酸磷、腐殖酸铵磷、腐殖酸钠、腐殖酸钾、高氮腐殖酸铵等。

^② 襄渝铁路东起湖北襄樊,西至重庆,全长 895.3 公里。由铁道部第二、三、四勘测设计院和电气化工程局设计,自 1968 年 4 月由铁道兵担负施工,1979 年 12 月全线建成,并正式交付运营,是联络中国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对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

西大地标

办公中心。学校基建处在保持第三十四教学楼总体构型不变的前提下，对室内进行了装修和美化。把现代的室内装饰艺术与古朴的建筑外观形式有机地融为一体，给人一种鲜明的时空感和艺术感，使师生在教学相长中得到新的美感体验。而今第三十四教学楼矗立在绿色的大地上，掩映在红花绿叶中，在色调和体量上都与周围的环境高度适应。青色的砖、灰色的瓦，朴素淡雅的色调给人以安静温馨的感觉。洁白的门柱、青砖的墙体和十字板瓦坡



浓荫密布中的第三十四教学楼一角

顶，掩映在丛林绿地之间，透露出清新素雅的山林趣味。第三十四教学楼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一门可以进入，这种门庭设计方式既表达了欢迎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来此求学的教育理念，又很好地体现了校园建筑本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在校园建筑群体效应中，第三十四教学楼以其外在的清新和内在的厚重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自身的包容性勤勉育人，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无数师生

忆之念之的“老朋友”，亦在岁月流转中成为西南大学校园建筑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跟随这位“长者”的步伐，阳光还是那样的灿烂，花草树木在阳光的普照下奋力成长，而第三十四教学楼也在绿绿的大地上向着“绿色”开启了新的征程。

编后记：本文在成文的过程中，相继采访了多位老教师，在此特向热心提供帮助的老师毛炳衡、杨德

海、陈万铃、余杰、赖守悌、马俊英、付显兰、江育璋、蒲富永、魏昭林以及其他给予帮助和支持的老师致以崇高的谢意。

(责任编辑 郭 兰)



第三十四教学楼东门(植物保护学院正门)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上第一个

高级
“宾馆”

□口述/李兰 整理编辑/李亚勃

编者按：西南大学正门所对的行政楼的背后有一座小山，沿着布满青苔的石阶小路往山上走，在半山腰上坐落着一栋青灰色的二层小楼。没有人会想到，隐没在山林之中的这栋小楼曾经是西南师范学院历史上第一个高级“宾馆”，在这里曾接待过到访的苏联专家及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等。



隐没在丛林中的青灰色小楼

这栋楼与川东行署办公楼（现为西南大学行政楼）一起，于1951年建成。修建之初，一楼为川东行署主任阎红彦^①的办公室及警卫、秘书等的住房，二楼是阎红彦的住房。1952年西南师范学院搬来后将此楼命名为民主村2舍，整栋楼作为学院的高级招

待所，接待各级领导。

1954年12月西南师范学院院长张永青^②调到西南师范学院后，一楼作为其一家人的住房，二楼仍为学院当时最好的招待所。1955年苏联心理学家费洛托夫来我校讲学，就在二楼住了1个多月。1957年

^① 阎红彦(1909—1967)，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3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邯郸、陇海路、定陶、渡江等战役，取得显著成绩。建国后，历任中共川东区委副书记、川东行署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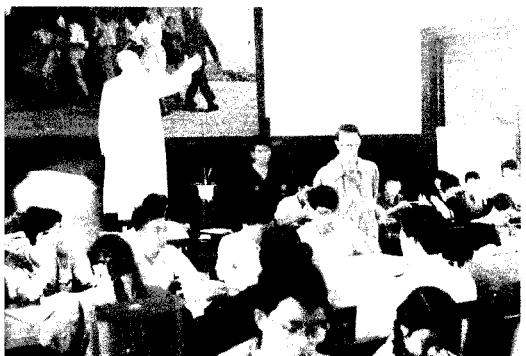
^② 张永青(1916—1999)，原名张积玉，山西榆次人。1930年至1934年在太原成成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五台、崞县、定襄县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第八地委宣传部部长、书记，晋绥第八军分区政委，中共吕梁区委宣传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川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川北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副部长，1954年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在近30年时间里，除“文革”中的个别时段，一直担任学校的党政主要领导职务。1983年任中共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常委，1990年离休。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0707-019。



苏联共青团大学工作部代表团来院参观



苏联政治经济学博士来院讲学



1964年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来校视察



1964年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右一)来校视察

冬,西南师范学院书记孙泱^③调到学院后,其一家人住在二楼。1960年孙泱调走后,二楼仍旧作为学院的招待所。1964年教育部部长杨秀峰^④等来校视察时也住在二楼招待所。据悉,杨秀峰在此住了一两个月,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永青院长一家搬出了该楼,造反派、哈工大^⑤先后进驻该楼。自此,这

栋楼结束了她作为西南师范学院高级“宾馆”的历史。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张永青院长一家搬回来,住在楼上,楼下做了出版社和文科学报编辑部的办公室。

1985年西南师范学院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同年,外籍专家楼竣工^⑥,成为当时学校最好的,也是北碚有名的“宾馆”。1988年西南师范大学学术交流

^③ 孙泱(1915—1967)原名孙宁世,南溪县人。朱德挚友孙炳文烈士的儿子。光华大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肄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科长、中共嫩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建国后,历任国家计委军工局局长,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④ 杨秀峰(1897—1983),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于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全国解放后,历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五届人大常委,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⑤ 1970年1月28日,重庆市革委会通知西南师院哈工大要搬来,让学校做好搬迁工作。1970年10月24日,四川省革委会发出了《关于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外语学院搬迁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定西南师范学院迁往万县地区的梁平县、忠县,要求于年底全部完成搬迁工作。11月,学院被迫离开北碚,搬往梁平县和忠县。1973年7月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重庆工业大学(原哈工大)仍迁回哈尔滨的决定,并发出了《关于重庆工业大学仍迁回哈尔滨的通知》。国防科委根据中央的决定,于1973年8月7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通知》的搬迁工作会议。1973年8月24日,四川省革委会发出了《关于西南师范学院迁回重庆北碚的通知》。详见《西南师范大学校史》P172、P183。

^⑥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0-jj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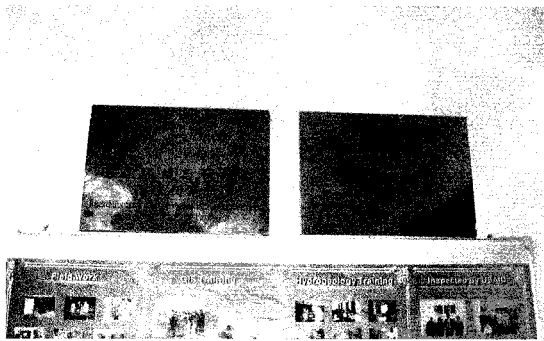
中心一期工程竣工^⑦,1994年我校申请将学术交流中心(招待所)扩展为接待外籍人员住宿招待所^⑧,后更名为桂园宾馆(含桂园酒楼)。如今,三星级的桂园宾馆成为西南大学(2005年两校合并组建西南大

学)校内承接国内外会议和接待各级领导的主要宾馆。而学校当年最早的高级“宾馆”几经变迁,现在已“华丽转身”,成为地理科学学院岩溶地质学家袁道先^⑨院士的办公楼。

(责任编辑 蒋涛)



袁道先院士办公楼



西南师范大学岩溶环境与石漠化治理研究所

校史求证

□文/姜海庭

从《西南大学记忆》2009年第4期刊登的文章《那些园与“村”》^①一文中,我们了解到在兼有北国雄浑和江南秀美的西南大学校园里,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各色的“村落”和园区。人们将教职工居住的地方称为“村”,把莘莘学子居住的地方叫做“园”。这些“村”与“园”既表达了西南大学师范和农业两大办学方向,又在风雨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村’文化”和“‘园’文化”。

然而在我们收集档案史料以及采访学校老领导和退休老师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西南大学除了“‘村’文化”和“‘园’文化”,还有一个很有地域特色的“庄文化”。据悉,“庄”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左右供西南师范学院的工人居住的地方,根据

方位分为东庄、西庄、南庄和北庄。而今东西南北四庄的平房已不见踪影,但是与四庄息息相关的记忆还在。

为了给读者呈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也为了更好地收集、整理和丰富西南大学的“住宿文化”,我们特向全校师生、各届校友以及社会人士求证:东西南北四庄分别是何时修建的,何时拆除的,为什么拆除;在这里居住的工人是从哪里来的,来这里做什么;在这里发生过哪些感人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老照片等等。有知情者,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023—68367435

邮箱:xdjy2009@126.com

(责任编辑 郭兰)

^⑦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1-jj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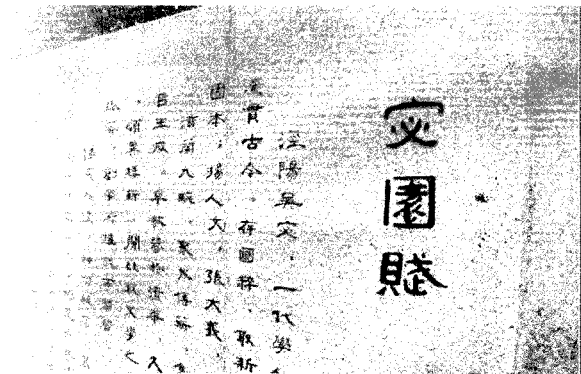
^⑧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4-ws11-4.0007。

^⑨ 袁道先院士,男,国际著名地质学家、水文地质学家、岩溶学家。1944~1946年间就读于重庆青木关中央大学附中。1952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南京矿专。1958年后,先后历任山东、云南、广西地质局水文地质大队和重庆两江水文地质大队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和原地矿部岩溶地质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联合国国际岩溶研究中心(IKRC)主任,中国第四纪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地质学会岩溶专业委员会主任,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岩溶环境与石漠化治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师资队伍介绍网页。

^① 详见《西南大学记忆》,2009年第4期,第52—54页。

宓园赋

□文/秦效侃



编者按：芳草萋萋，林花著雨；飞檐寂寂，青阶斑驳。这里是文学院旁边一处雅静的园子，为纪念国学大师吴宓先生，故以“宓园”命名。园中有秦效侃撰文并书写的《宓园赋》^①为证，细数先生杰出成就及坎坷经历，以示后人瞻仰之缅怀之。

泾阳吴宓，一代学人。学兼中外，淹贯古今。存国粹，取新知，尊儒术以固本；扬人文，张大义，泛爱众而亲仁。滋兰九畹，聚火传薪。隽彦从游，多以玉成。早饮誉于清华，久怀德于士林。领异标新，开比较文学之先路；发蒙振落，创《学衡》杂志而蜚声。

倭寇入侵，神州板荡。哀命之陆危，恸华北之沦丧。于是先生随校播迁，同灾黎之苦难，遵江湘而流亡。至滇至黔，至于锦江，或至汉沔，乃止东阳。船唇马背，破屋绳床。学教不辍兮，如砺如砥；风雨如晦兮，鸡鸣不已。经八年之颠连，唯昭质其未亏。

解放迎中华之再造，人民乐更始之新元。劫余山斗，初汉伏辕。荀卿最为老师，大儒惟务正言。爰因雅望，迭至礼延。谢纷纭之蒲轮，乃徙倚而未迁。先生执教西南师范学院。历历史系、外语系、中文系，通才而多任；博以文，约以礼，身教而言传。即之温温，望之昂然。端体貌之清癯，时容与于校园。杖履飘萧，布袍若仙。君子居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达人知命，厄磨竭于廿八之年。

嗟夫！十载苍黄，火炎昆冈。万里羹沸，宇内蜩螗。视萧艾之争荣，惜兰芷之不芳。缙云高而烟雨低迷，嘉陵瘦而水流凄怆。先生胫折目盲，心疾难瘳。委衰残之垂暮，依妹氏而首丘。

又十余年，重际升平。西南大学崇教化，美风俗，述往事，思来者，建宓园纪念先生。小园杰构，显敞而幽。乔木亭亭，绿草油油。槐子黄时，木犀香候。铺青石以为径，立明轩而非楼。屏山如黛，连九峰以竞秀；渌水涵春，汇一江而长流。虽哲人其已往，嘉流风之未休。莘莘学子，如亲馨欵；咨尔多士，力奋宏猷。

嗟夫！人文才知，地负海涵。代有人出，立德功言。潭潭学府，名重西南。园以人名，仰止高山。

秦效侃/撰

公元二零零七年五月于未花室

^① 原件现收藏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博物馆。

宓园简介：

宓园位于西南大学第一、三教学楼之间的林中,宓园地形为三角形,占地约 1600 平方米,于 2007 年为纪念吴宓先生而建。

靠文学院的一面为园子入口处,点缀以自然山石,上题词“宓园”,是整个纪念序列的起始点。设计者别具匠心,利用地形和现有植被,设计了逐渐抬升的三层序列小景,象征吴宓先生一生中的三个“28”年。第一个 28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就读于哈佛大学,激扬文字,树立志向,奠定他人人生坚实的基石;第二个 28 年,先后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学衡》,奠定其西洋文学、比较文学先驱地位,培养出钱钟书、曹禺、吕叔湘、季羨林等杰出人才;第三个 28 年,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晚景凄凉,寿终于 1978 年 1 月 17 日。园子周边散置的石凳象征吴宓先生桃李满天下。四块条石与七条铺装带相结合,构成“28”这个概念。

园子通过一个长形广场和方形广场的错落叠加,形成构图中心。第一层的长形广场中有一面《宓园赋》景墙,读之可对吴宓本人的学问与人格有大致的了解。《宓园赋》为文学院著名教授、书法家秦效侃先生撰文书写,文典雅沉雄,字苍劲质朴。第二层的方形广场中,吴宓先生的大理石头像,面带微笑,温



宓园风景

仁敦厚。沿着连接两层广场的台阶拾阶而上可抵达园子的至高点。郁郁葱葱的夜来香丛间一亭翼然,便是青砖青瓦的“吴宓轩”,上悬秦效侃先生题书的横匾“吴宓轩”,外悬一联:“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吴宓轩”采用歇山屋顶,三面通透,一面为实墙。实墙面上的浅浮雕塑出吴宓先生的形象,上书其生平。

宓园是吴宓先生精神人格在西南大学的栖息地。园子林木错落,花草丛生,在喧嚣中保留着它的质朴和宁静,在岁月的变迁中愈显厚重和深邃。这里现已成为学子们晨读、学习的好去处,成为校园中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



吴宓轩

(责任编辑 韦雪贞)

自办砖厂建家园

□整理编辑/王贤 牟乔雅

编者按：20世纪50年代，西南农学院天生桥新校址处于初步建设阶段，砖瓦需求量很大，但砖又非常缺乏。为了按时将建校工作完成，学校决定自力更生，自办砖厂，解决建校用砖供应不足困难。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中有关学生制砖、运砖及用自制红砖所建红砖楼、综合大楼的老照片，展示了当年学院师生热火朝天共建家园的历史记忆。

西南农学院在建校初期共办过两次砖厂。

第一次始于1952年下半年，学院天生桥新校址即将动工，急需用砖。当时川东行署即将被撤销，他们在北碚袁家坝（现西南大学南区温室一带）有三个砖窑，经学校研究决定由基建科科长王远伦^①和他们商谈，随后川东行署决定把这三个砖窑以及工人一

起移交给学院。这三个砖窑主要生产的是红砖，西南大学现存的12幢红砖楼当时建造所需的120多万块红砖都是由这三个砖窑生产。红砖楼每幢两户，共24户，是学院当时条件最好的住房。我国著名土壤学家侯光炯院士、叶谦吉、蒋书楠^②、蒋同庆^③、蒋杰^④等知名教授都曾住在红砖楼。

^① 王远伦，男，工程师。1947年考入原私立相辉学院文史系，毕业后留校参加西南农学院建校工作，此后在西南农学院工作长达35年之久。负责并参加了学校新建宿舍、人防工程、农场建设等工程，并于1956、1963、1986年组织制定了学校的总体规划方案。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408-042。

^② 蒋书楠，男，1932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1948年至1949年在美国衣阿华州立农工大学研究院学习，1952年调入西南农学院工作，历任西南农学院教务长、副院长等职。曾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四川省农业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1990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1216-002。

^③ 蒋同庆（1908-1988），男，江苏省涟水人。早年毕业于江苏劳农学院，1933年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养蚕教研室攻读家蚕遗传育种。1952年调至西南农学院任教授兼养蚕教研室主任、家蚕遗传育种室主任。《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名录》第334页。

^④ 蒋杰（1909-1986），男，江苏省武进县人。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4年至1948年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相继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52年调至西南农学院农经系任教授兼系主任。《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名录》第330页。



学院自制红砖所建红砖楼^⑤



1965年侯光炯(前排左四)60寿辰于红砖楼家门前合影^⑥



同学们在自制青砖^⑦

第二次办砖厂是在1960年,当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建筑材料需求很大。学院建筑用砖需提前一年向重庆市申请,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学院就在现在的第五运动场一带又办了一个砖厂生产青砖,以解决学院部分用砖供应不足的困难。当时有很多学生参加了劳动,自己动手制砖。

^⑤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7。

^⑥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22。

^⑦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同学们在嘉陵江边运砖^⑧



同学们在嘉陵江边运砖^⑧

经过两次办厂和重庆第二砖瓦厂的支援，新校址的建设基本上顺利完成。



上世纪 50 年代曾参加原西南农学院综合大楼建设的师生在楼前合影^⑩(摄于 2010 年 12 月)

50 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师生现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当我们问起这段历史时,他们都是满脸自豪,不约而同地说道:“我们都亲自参加了校园的建设!”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王远伦的口述)

(责任编辑 李亚勃)

^⑧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⑨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⑩ 左起:陈贤源,1958 级农业机械化学生,修建综合楼时负责设计改造板车,把板车载在拖拉机后面,并驾驶拖拉机运输土石方;陈则刚,1958 级茶学专业学生,当时主要工作是搬砖、挖地基、运土石方;王有超,1957 级学生,当时主要工作是搬砖;付显兰,1959 级农业机械化专业学生,当时主要工作是挖地基;王远伦,基建科科长,当时负责工程总体建设;李金泰,1958 级茶学专业学生,当时负责宣传报道修建综合大楼中的好人好事,同时也参加挖地基;徐正华,1953 级农学专业学生,当时主要工作是去嘉陵江边搬砖;林元吉,1955 级学生,当时主要工作是挖地基、运输土石方。

编者按:2010年7月8日—7月15日,在具有百年历史的兰州大学举办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第11届年会,我校是本次会议被接收入会的四所高校之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分会现有高校会员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共44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大学校史研究与大学内涵发展”,并设有“校史研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为与作用”、“校史研究与校史馆建设”、“校史研究与大学年鉴编写”、“新时期校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重点,新形式,新方法,新经验”、“校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效果研究”五个相关子题。此次大会共收到来自会员单位的论文51篇,最终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第11届年会论文集》,本文即是选自其中的一篇(内容有删减),以供高校校史研究工作者学习和交流。

文化

大学校史研究中的真谛

□文/王列平^①

从大学校史研究的状况来看,存在着一种文化失缺现象:过多地注重学校发展的外在因素,而缺乏大学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深刻内涵的表达。至于大学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信念、理想追求等就更加不如人意。如此研究,不仅有碍于传承、传播、辐射大学文化,同时也难以担当起乐育人才的功效。鉴于此,拓宽大学校史研究的思路,改进研究的方法,应当从文化入手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文化与大学校史的关系

“文化”一词,古今中外解释歧见纷纭,但概括提炼后,大致可归纳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二说。

所谓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劳动创造成果的总和,

以及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属于广义文化,它将人类社会的历史生活全部纳入了“文化”的范畴之中。

至于狭义文化,则是指与特定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并以语言为符号进行传播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有学者则认为,狭义文化也是一种“社会信息”^②)。而本文所论及的“文化”,仅限于狭义文化,人们将其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可见,文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

既然如此,那么,文化与大学校史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诚如恩格斯所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③大学校史亦是如此,它既是大学历史发展的物化产物,也是

^① 王列平,男,吉林东丰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副研究员,大学文化程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现代史和文学史。

^② 蔡俊生等著.文化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2.

大学历史发展物化了的的文化,其核心价值是“大学精神”,其表现形态则是“大学文化”。由于大学文化是大学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和凝聚的思维定式与行为方式,并通过特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表现出来,因此,大学文化不仅具有高度的认知性、创新性、多元性和批判性等显著的特征;而且大学文化还具有很强的传承性、传播性、辐射性和教化性等功能。

由于文化与大学校史一样,不仅具有强烈的个性,而且带有自身的特点独立于世。因此,文化与大学校史之间存在以下三层关系:

其一,文化与大学校史的建构关系。任何一所大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有了自身的校史,不管校史长短,总之一所大学的文化也就有了起源。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人物的更迭,学校文化的底蕴在不断地加深,学校文化的容量在不断地拓宽,最终形成了被人们称之为的“大学文化”。这种大学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有的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今天我们所认知和研究的大学校史文化,就是文化与大学校史建构关系的结果。因此,要了解 and 认知一所大学,首先要了解和认知这所大学的历史,并从它的历史中了解和认知这所大学的文化。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和认知这所大学的全部内涵。

其二,文化与大学校史的从属关系。大学校史属于文化范畴,是历史发展了的物化结果。由此,大学校史研究的对象,是一所学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长期凝结而形成的一种具有特殊个性的文化。因此,大学校史不仅从属于文化,而且文化也是大学校史研究的魂魄。只有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文化,生动具体地表现了这种文化,批判和继承了这种文化的精髓,大学校史研究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真正担当得起传承、传播、辐射大学精神文化、起到鉴史知今,教化人才的作用。

其三,文化与大学校史的传承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

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大学校史作为一种载体,它所反映、表现和研究的对象是文化,其作用就在于传承、传播、辐射大学文化。而大学文化正是通过大学校史载体得以传承、传播和辐射,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黑格尔说:“文化传统……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⑤所以,研究大学校史的终极目的在于研究一种膨胀愈大的具有特殊个性的文化形态,在于传承、传播和辐射这种膨胀愈大的具有特殊个性的文化。而如何运用和发挥大学校史这个载体的作用,就看我们对这种具有特殊个性文化的理解和认知程度的高下来决定。所以,当我们在强调大学校史研究的重要性时,其本质是在强调研究这种文化的重要性;当我们在发挥大学校史育人作用时,其实质是在发挥这种文化育人的作用。可见,文化,才是大学校史研究中的真谛。

大学校史文化的内涵

众所周知,文化是表现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形态,是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判断和追求。因此,这就决定了文化具有:思想、制度、行为及器物四要素,它们既彼此相连,又相互制约和影响,共同推动文化的发展。既然大学校史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大学人经年累月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并具有独立个性的大学文化。那么,其内涵又包括了哪些方面呢?

其一,大学物质文化。大学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建筑和器物两个方面。其中建筑包涵了当年大学人处于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一种事物的理解和认知;含盖了对当时文化、艺术的一种追求和理念、情趣的表达。透过它们,可以使人们认知到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诞生的人物以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至于器物而言,它们的存在则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9.

^⑤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8.

这种不同寻常,不是指器物的本身,而是指透过器物背后所蕴含的这种历史文化向今人倾诉和反映的当年的大学中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一种历史物化了的文化表达和传递。

正因如此,当人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器物时,所想、所思的不是建筑物、器物本身,而是由衷地赞叹它的艺术价值和高雅情趣,是钦佩和折服前辈们的开拓精神和创新勇气,也是不断地探询和追问发生在那遥远的故事。可见,大学物质文化是大学校史文化的历史物化表现,是通过物质来表达和传递大学人内在精神文化的躯体。

其二,大学精神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作为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等,归根到底是受人类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⑥但是,文化一经产生便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它不仅相对于政治、经济来说具有其独立性,就是对人类而言,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正如德国当代著名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评说道:“尽管文化只是源于人类,而且为了保存文化的生命力,人作为承担者使用文化,并用文化来充实自己,但文化并非附属于人,而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与我们分离,如同自然先予的世界与我们分离一样。我们无法逃脱地站立在我们创造的文化世界中,也就像我们站在自然世界中一样。”^⑦由此可见,当大学精神文化在经历了历史考验后,已成为一种脱离母体的外在的力量,不管以后如何,都将代代相传。所以,大学精神文化成为了大学的灵魂,是大学人执着追求的理念和捍卫的信仰。

大学精神文化概括地说有以下三个层面:

1. 校园思想层面。校园思想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不仅具体地呈现了大学人办学的目的和宗旨,而且也是大学人面对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的一种客观真实的反映。概括起来,即包括了精神、理念、信仰等。由于大学人具有比一般社会人更高、更强的思想性、思虑性和忧患意识,以至于成为思想解放的先

锋。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轨迹看,每当遇到民族危亡和时代转换的关键时刻,大学人往往成为思想的解放者,最先觉醒,奋力反抗,甚至赴汤蹈火,甘愿献身。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足以证明大学人的血液里流淌着“先天下忧而忧”的秉性。于是,博大厚实的人文精神、不惧险阻勇于探索的理念和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信仰便构建成了大学人的思想层面。

2. 校园伦理层面。校园伦理是约束、规范大学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包括了道德、品质、风范等。首先,大学人不仅具有一般社会人所应具有伦理道德观,而且还应具有区别于有一般社会人所持有的一种特殊的校园伦理道德观。其次,由于道德具有一种传递性和感染力,因而大学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乎着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关系到科学文化的传播和运用。因此,大学人的为人师表则显得极为重要,如严于律己的自省精神,学而不厌的至真精神等。可见,对大学人来说,修身是内在潜质的提高,而风范则是外在精神面貌的展现。

3. 校园风气层面。所谓“风气”,其实是在思想意识的支配下所形成的一种行为作风。因其不象思想意识那样十分抽象,在现实生活中能深切地感受到,故而,将风气与思想分割出来论述。

从历史上看,一所大学在漫长的办学过程所形成的风气将直接关系到学校办学成功与否:良好的校园风气不仅能营造出一种和谐的人文情怀的环境和学术自由发展的天地,同时对人才的培养也将起到潜移默化,无形胜有形的教育。校园风气即包括了民主的风气、自由的风气、批判的风气等。民主的风气是办学的根基,它关系到学校一切的教学活动、管理活动、行为活动能否顺利进行。自由的风气则是促进学术繁荣和发展的前提,是学术上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精神的体现。而批判的风气则表达了大学人追求真理,不断完善的一种独立行为。如果没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科学就不会进步,文化就不会发展。因此,只有秉持一种批判的精神,才能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4.

^⑦ 【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60.

其三,大学制度文化。大学制度文化是学校中的规范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是维系大学内部运行与外部关系的法律、法则和相关的条例、规定、管理制度等。由于大学制度文化的特殊性,使之成为了连接大学精神文化和大学人行为的桥梁。因而,在制度文化生成和执行过程中便折射出了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从大学制度文化自身来看,是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价值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以有形的制度作载体表现在管理层面上起到规范和制约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又以无形的价值渗透在学校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大学制度文化发展得越完善,其无形价值在各方面的体现就越浓厚,并与制度所承载和推动的文化也就越趋同。

由此可见,一所大学真正有价值、有魅力、能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所学校文化积淀,尤其是被广泛认同的制度文化。因为,学校的制度只有真正被大学人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它才能成为一种有力量的文化,才能使学校成为制度共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大家庭。

大学校史文化的价值取向

如何看待大学校史文化?人们会从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去考察和透视,但最终结果都离不开对它评价,即大学校史文化的价值。黑格尔有句名言:“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⑧既然大学校史文化是合乎理性存在的现实,那么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凡是有价值的事物就会产生一定的价值取向,即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

鉴于此,对于大学校史文化的价值取向又该如何去考量和认识呢?

首先,大学校史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中西方许多著名的大学校训中都给予了充分地反映:如哈佛大

学的校训是一个字:truth(真理,有人将它译为“让真理与你为友”);耶鲁大学大学校训:light and truth(光明与真理);北京大学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中国人民大学校训:实事求是。由此可见,追求真理不仅是大学文化特质和价值的体现,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这诚如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演讲时所说:“耶鲁大学校训强调追求光明和真理,这符合人类进步的法则,也符合每个有志青年的心愿。”^⑨就大学校史文化而言,追求真理同样是其特质和价值所在,而其过程与其价值取向则都应建立在一种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从历史上看,大学文化的批判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如在中世纪欧洲,当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统天下之时,是大学文化发挥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化的作用,彻底撕下了基督教文化虚伪的面纱,把“人”从天堂请回了尘世。五四时期,中国大学文化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大声呼唤“民主与科学”。于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⑩大学校史文化的价值取向亦是如此。

大学校史文化是通过历史的沉淀之后,在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存留下来的历史物化了的精神文化,因此同样具有很强的反思与批判性。因为,反思与批判本身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是一种内在精神追求的表达方式,它不仅可以使大学精神、理念、道德、风气、制度得到升华,同时也呈现大学校史文化的价值取向。所以,当我们在研究大学校史文化的过程中,其反思与批判的价值取向依然存在,且始终是维护和发展大学精神文化的原动力,也是大学人所要坚持的一种主体价值选择。

其次,应该从大学文化内在功能和作用去考量和认识它。大学文化承担的主要责任是教育,而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使受教育者传承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正如美国行为主义领袖斯金纳所言:“当一种文化发展出一种新习俗行为,并利用它来获得用其他方式难以得到的食物资源时,它不仅向新成员传递了这种习俗,而且也将这种习俗传播给同时代人或

^⑧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3.

^⑨ 中国新闻网,2006:4.22.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

上时代人的幸存者。”^①当然,实现人类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可以有多种途径的选择。但是,学校教育则是传承与传播人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因而其功能和作用价值就在于此。

就大学校史文化而言,传承与传播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文化,不仅体现了这种特殊性文化的价值,而且也体现了它的价值取向。为此,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指出:“可以将文化过程当作自成一体的事物,必须依据文化自身来解释文化,……对文化过程只能依据文化自身加以说明。”^②大学校史文化就其自身来说,尽管不是大学文化的全部,但却是一种浓缩了大学文化历史的精华,其内涵和精神极具深刻性、思想性和文化性。不仅如此,还由于大学校史文化将历史物化了的精神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和表达方式,这也使得受教育者在接受大学文化精神时,显得更直接、更明快、更清晰地就获得了这种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并认知了所要传达的信息。显而易见,大学校史文化既是传承与传播大学精神文化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凝聚、升华、吸收、批判大学精神文化改造者。而这两者皆有的身份,显示出了大学校史文化的价值与价值取向重叠的重要性。

第三,应该从大学文化的内在生长与发展中去考量和认识它。大学文化内在的成长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赋予大学文化的责任所在。正如朱谦之先生指出:教育“一方面仰倚着过去为文化之传达;一方面俯视着将来,为文化之创造,而最重要的,却在乎现有文化之认识与把握,引申现在的文化而进于将来之文化理想。”^③据此,可以认定大学文化生命力的全部价值在于发展与创造文化。

就大学校史文化而言,发展与创造文化同样也是大学校史文化的价值取向。因为,大学校史文化在适应现有文化发展时,不能以丧失自身发展的规律为代价。所以,当我们强调大学校史的基本功能时,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历史物化了的精神文化功能,在强调大学校史发挥教化功能时,其目的是通过这种

精神功能予以折射,来适应现有文化,发展与创造文化。当然,适应现有文化,发展与创造文化的途径很多,并不是大学校史文化所独有。但是,究其功能与效果来看,大学校史文化似乎来得更直接、更明确、效果也比较显著。

1.知史鉴今,发展与创造文化。马克思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④同样,一所大学校史文化是这所大学现有文化的全部历史基础,也是现有文化以往活动的产物。因而,人们往往以此为基础来发展与创造文化,同时人人还常常以此为标准来检验和评判现有文化。于是,大学校史文化便在大学文化的内在生长与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培养人才,实现发展与创造文化。培养教育,熏陶感染是大学校史文化教化功能的表现形式,而这其中也就隐含着发展与创造文化的重要因素。这正如田培林先生所指出:“教育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即有创造欲望与创造能力的人,既然能够进一步使那些来自过去的文化材(“文化材”指人类精神活动所创造的一切价值的总体——引者)由旧有的定形的价值发展而为一些新的价值,也就能够循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进步,这是其他一些文化材的价值所不能和它相比拟的。”^⑤可见,大学校史文化正是通过其教化功能的转移,从而实现了发展与创造文化。

(责任编辑 姚 恒)

^①【美】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31.

^②【美】怀特,文化的科学[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71.

^③朱谦之,文化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39.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1.

^⑤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6.

档案馆举办『庆祝西南大学组建五周年档案馆部分藏品展』

□文\张晓华

“庆祝西南大学组建五周年档案馆部分藏品展”于2010年11月18日至11月19日在校史展览馆里举行。

展览由重要题词、名人字画、校史人物藏品、杂项四类组成。在展出的100余件藏品中,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等国家领导人为学校的题词;有启功、苏葆桢、徐无闻等名家的作品;有侯光炯院士、吴宓教授、袁隆平院士等校史人物的藏品;有曾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的印章和校史人物的任命书、毕业证书、文革时期的资料。一幅画、一本书,或是一张简单的便笺,从不同侧面反映着西南大学历史上值得记忆的人和事。

黄蓉生书记和向仲怀院士等校领导和专家学者仔细参观了此次展览,并对校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作出指示。向仲怀院士当即表示愿意捐出他珍藏的重要资料。许多师生驻足观赏品味,分享着档案文化的芬芳。



2010年11月18日,西南大学党委书记黄蓉生(右二)等参观展览



2010年11月18日,向仲怀院士(前一)等参观展览

(责任编辑 李亚勃)